

李霖泰研究：权力与服务

LEE LAM THYE: POWER AND SERVICE

温逸敏

ON YEE MIN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18**

李霖泰研究：权力与服务

LEE LAM THYE: POWER AND SERVICE

By

温逸敏

ON YEE MIN

(10ULM02124)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中文）学位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DECEMBER 2018**

摘要

李霖泰曾担任我国多届的国会议员，任内获得“小贩之父”的称号，在卸下国会议员身分之后，他继续以社会工作者的身分为人民服务。由于李霖泰多年来积极地为社会与人民服务，深受政府与民众的肯定，在1995年获得霹靂州苏丹封赐拿督勋衔，2002年更获得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勋衔。

本论文以李霖泰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他对人民，社会与国家的服务，贡献和影响。除了梳理李霖泰的事迹与人格特质之外，将分成两大部分来探讨李霖泰的服务生涯，即（一）他从政时期对选民，政党及国家所作的服务和贡献；（二）他退出政坛转型为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和贡献。藉此探究他如何贯彻其政治理念与服务人民及社会的理念。

李霖泰的政治理念是不分种族肤色为人民争取福利，积极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解决所面对的问题。退出政坛后，李霖泰并不因此而停止他的理想与目标，他服务人民与社会的理念依然强烈，甚至因为无需再兼顾国会议员的职务，所以更积极为人民服务，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工作者。李霖泰担任超过二十个非政府组织要职，是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典型代表人物。

关键词：李霖泰；民主行动党；社会工作者

Abstract

Lee Lam Thye served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many terms. During his term period, he received a title as the “father of street seller”. He continuously played a role as a social worker and actively served the people, even after he relinquished his political position. Due to his active involvement in serving the community, he was well respected by the people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 In 1995, he was given the title of ‘Datuk’ by Sultan of Perak. In 2002, he was given the title of ‘Tan Sri’ by Yang Dipertuan Agung.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d on Lee Lam Thye, and the research covered his influences and contributions on serving the people, community and nation. Apart from collating Lee Lam Thye’s deed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the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namely:

- (1) His service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peopl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nation throughout his term period.
- (2) His service and contribution after relinquishing his political position and becoming a social worker.

As such, this thesis looked into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ommunity serving philosophy.

Regardless of ethnic groups, Lee Lam Thye’s political philosophy was striving for people’s welfare, actively served people and solve their problems. After withdrawing from politics, Lee Lam Thy still kept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community unceasingly. Without the need of taking the duty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this enabling Lee Lam Thye becomes more involved in serving people and participating social activities. Eventually, Lee Lam Thye became an active social worker. Lee Lam Thye hold more than 20 NGO positions, who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NGO.

Keywords: Lee Lam Thy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DAP), Social Worker

谢词

一手独拍，虽疾无声。这份论文得以完成，不是单靠我个人的力量。尤其在收集资料方面，如果没有师长、同学、朋友的鼎力相助，是无法成事的。因此我借此机会感谢每一位在我撰写论文期间所给予的帮助和鼓励，让我顺利完成论文。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张晓威老师。张老师身为中华研究院院长，无论事务多么繁忙，他总是尽其所能拨出时间与我讨论以及用心和耐心地指导我。在这期间如果没有老师的督促与指导，恐怕这份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感谢郑文泉老师给予的鼓励，他的良言玉语时常让我有所启发，让我可以有不一样的视野。感谢郑文德老师的帮助，藉着他的人际关系，才得以获得更多的剪报资料。

此外，也非常感谢丹斯里李霖泰先生，他身兼多职，忙于公务，但是都会在短时间内回复电邮和短讯。感谢叶健安先生愿意接受访问和给予我相关资料。感谢前行动党图书馆负责人，蓝中华先生和曾繁道同学的帮助，才可以顺利搜集到更多有关行动党的资料。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是我最大的力量，尤其是母亲，她时常在电话里关心和叮嘱我，体谅我在撰写论文的期间，无法时常与家人相聚，还天天打电话与我联系。还有，一直在身边给予无限支持、鼓励和帮助我的丘建妮，甚至充当司机载我到处去搜寻资料。在这段撰写论文的日子里，所幸有黄筱丝同学的陪伴，虽然身在英国，但是依然时常保持联系，互相鼓励和问候，让我不至于孤单。还有感谢我的同学们，周美芬、林丽华、黎翠雯、王凤娇、严秋霞和 Emily 小姐，还有许多没有称呼的朋友与同学，感谢你们的鼓励和分享，也让我的硕士生涯有美好的回忆。这篇论文的诞生，是大家的功劳，缺少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完成不了。在我学习的路程上，每个人的付出，那怕是一句话、一声问候，都足以让我曾经疲惫的心温暖；阻塞的思维得以清晰。因此，我谨以此论文的成果，来答谢大家。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李霖泰研究：权力与服务为温逸敏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张晓威）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

日期：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10.12.2018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温逸敏（学号：10 ULM 02124）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张晓威副教授兼院长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李霖泰研究：权力与服务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温逸敏）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温逸敏

日期：10.12.2018

目录

	页数
摘要.....	i
Abstract.....	ii
谢词.....	iv
论文核实书.....	vi
论文提交书.....	vii
论文声明.....	v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机.....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	8
第四节 论文框架.....	9
第二章 李霖泰的家世与人格特质.....	11
第一节 李霖泰的家世背景.....	11
第二节 李霖泰的人格特质.....	19
第三章 李霖泰与政党政治.....	28
第一节 李霖泰与民主行动党.....	28
第二节 李霖泰的政治成就.....	37
第三节 李霖泰退出民主行动党和政坛的原因.....	39
第四章 李霖泰的社会服务.....	52
第一节 李霖泰在任内的服务.....	52
第二节 李霖泰退出政坛后的服务.....	62
第五章 结论.....	77

附表

附表一：李霖泰事迹简表.....	82
附表二：李霖泰从 2000 年至 2017 年获得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85
附表三：李霖泰获得的勋衔与奖项.....	86

附图

附图一：安邦（Ampang）的一位马来小贩把锦旗交给李霖泰.....	90
附图二：李霖泰走访中南区菜市场时，与小贩握手.....	90
附图三：李霖泰走访半山芭（Pudu）菜市场时，与小贩沟通.....	91
附图四：李霖泰在茨厂街(Petaling Street)和市民一起清除垃圾.....	91
附图五：李霖泰走访陈秀莲路（Jalan Chan Sow Lin）的水灾灾区.....	92
附图六：李霖泰巡视 Sri Selangor 区组屋附近的沟渠情况.....	92
附图七：李霖泰巡视木屋区时的情况.....	93
附图八：半山芭居民在李霖泰办公室寻求援助.....	93
附图九：1989 年，在内案发令下被捕的林吉祥获得释放后，站在台上演说，李霖泰在一旁支持.....	94
附图十：李霖泰于 1986 年获得十大青年奖之影.....	94
附图十一：李霖泰于 1993 年获得最高元首封赐对国家服务有功勋章 JMN.....	95
附图十二：李霖泰于 1995 年 4 月在霹雳州江沙皇宫接领霹雳州苏丹颁 DPMP 拿督荣衔之影.....	95
附图十三：李霖泰巡视营地，并与营员了解营中的生活情况.....	96
附图十四：笔者与叶健安先生进行访问.....	96

引用文献.....	97
-----------	----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动机

美国历史家卡尔·贝克（Carl L. Becker, 1873-1945）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贝克首先分析历史一词和知识、事件及过去等用语的关连，并定义历史为“对于过去说过的与做过的事的记忆”（张隆志，2014：152）。人物在历史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物、环境与时代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作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代表人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代表人物的身上看到当时的环境、社会、风俗和时代，也可从这人物中得知他的性格、家世、地方和嗜好等等。历史所谓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梁启超，2008：143）。梁启超也说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的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里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梁启超，2008：144）。

梁启超认为一部“人的专史”对一个民族历史的认识极具意义。倘若将历史中的人物抽出，那么历史就不是历史了。人物，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他不只重视人，也强调个人或群体的关系，并把人与时

势、环境联系起来，互动地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里提到，历史所以演成，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梁启超，2008：145）。无论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历史，只要把人物抽出来，那么这历史就会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和意义。所以历史的撰写是离不开人物的。

纵观马来西亚历史、中国通史或世界历史，可以发现到历史是离不开人物的。研究历史是不能不研究人物，人物研究也被称为“人的专史”研究。“人的史传”是专以人物作为本位所编的专史。

笔者选择李霖泰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他的研究价值有别于其他的马来西亚政治人物，此外也与笔者的童年有关。笔者小时候从父母亲处得知李霖泰的事迹，尤其是他对选民的热心服务和随身带着打字机帮助市民的故事，更是让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李霖泰对于 1960 年代的草根阶级而言，就像是他们的英雄。这也证明了李霖泰为民服务的形象深入人心，只要人民面对问题，都会想到他。李霖泰在这方面，也尽全力地为人们服务，通常都会解决人们的问题。在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间，我国的议员们绝少会走出办公室去亲自与人们接触，听人们诉说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与问题，并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而李霖泰却是走出冷气办公室，亲自了解人们，接触和帮助他们。故此，笔者选择了李霖泰作为研究对象，以便可以真正的了解从父母口中所认识的李霖泰。

李霖泰自 1960 年代开始便是一位全职的政治与社会工作者。他曾经担任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以下简称为行动党）（英语：Democratic Action Party，简称 DAP；马来语：Parti Tindakan Demokratik）的副秘书长，也是行动党怡保支部发起人之一。李霖泰于 1969 年全国大选时，第一次参选便中选为武吉那那区（Bukit Nanas）的州议员，那年他才 23 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他于 1974 年大选时，中选为吉隆坡市（1986 年时改名为武吉免登，Bukit Bintang）国会议员。随后在 1978 年、1982 年及 1986 年的全国大选中，他连续蝉联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直到他离开行动党及退出政坛为止。吉隆坡武吉免登区也成为了民主行动党的堡垒区，历届大选到该区挑战李霖泰的马华候选人，如李裕隆、陈文金、黄循营及叶福兴等，都落败（丘光耀，2007：273）。这些候选人无法中选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李霖泰无论任何时候都尽心尽力、任劳任怨、随传随到地为选民们服务，巩固了他在武吉免登区选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好官的形象。

李霖泰在担任国会议员和州议员期间，除了尽力地为选民服务和解决民生问题，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半山芭区的小贩争取福利，积极地为他们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李霖泰也因此被冠上了“小贩之父”的称号。此外，小贩们为了感激李霖泰对他们的帮助，于是便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位于茨厂街的菜市场，即以“李霖泰菜市场”来纪念他。

虽然李霖泰身为一名行动党的高层领袖，可是他与林吉祥和其他党内的领袖处理事情的方式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李霖泰是属于行动党内的温和派，他以脚踏实地的服务来赢取民心，也获得在朝党领袖和政府官员们的赞赏，这是非常罕见的。李霖泰与其他行动党的领袖相比之下，可以显示出行动党里的另一个类型特征的反对党人物。这类型的反对党领袖与较激进的领袖相比之下，或许他不一定完全受到党员们的欢迎和接受。但这类型的人物在遭到批评的同时，也会获得赞赏。无可否认的是，行动党中确实也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反对党人物。

李霖泰在他的政治事业处于最高峰时突然引退，他先辞掉在民主行动党的副秘书长职位，之后于 1990 年 9 月 29 日正式宣布退出政坛。从此以后，李霖泰便在行动党和政坛上消失了。

李霖泰的突然辞职给大家留下了谜团，有消息指出他是不满意一些直辖区的领袖处处针对他和有些领袖在一项反收费站紧急会议中当众离席抗议而引起的。另一方面指出李霖泰是因为不满行动党和反对与 46 精神党结盟，也不满意华教人士新加入行动党就立刻身居高职而辞职的。也有消息指出蕉赖路收费站风波是他辞职的最大原因。李霖泰在退出政坛后，曾在《星洲日报》和《新明日报》发表言论说他不会收回辞职的决定，也不会跳槽到其他政党。这是他对行动党和人民的交代，也表明不是因为蕉赖路收费站风波而辞职的。尽管外界对他的辞职有诸多的猜测，可是至今他还是没有具体地说明辞职的原因。

无论是从政期间或隐退政坛后的李霖泰都非常活跃于服务民众。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的作风与风格，而李霖泰的个人风格是服务基层民众，积极为他们解决问题和谋取福利。因此也突出了他与当时其他执政党与反对党领袖不一样和特殊的地方。李霖泰隐退政坛后，虽然终结了他在政治的生涯，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在马来西亚历史上销声匿迹，他反而更加活跃于社会服务工作。由于他在从政时，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和服务社会的形象，因此当他退出政坛后就受邀担任许多社会团体、基金会、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的重要职位。

李霖泰继陈志勤之后，是马来西亚第二位获得丹斯里头衔的反对党领袖。他退出政坛之后，曾经担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主席、大马方犯罪案基金会副主席、大马陆军后备荣誉上校、国民团结咨询委员会委员、实达基金会主席、郭氏基金福利顾问和隶属卫生部的捐献器官教育小组主席等职位。他虽然是前反对党领袖，但是却受到政府的邀请，担任多个重要的职位，这是非常特别和罕见的例子。而且这位服务型的政治人物，即使离开了政坛也不余遗力的为社会与人民服务，这是不可多得的。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为李霖泰留下文献，以填补前人对李霖泰的研究所缺少的部分，尤其是他退隐政坛后的服务。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笔者所搜索和收集到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来自华社研究中心的剪报、中国报报馆的剪报、一些有关书籍和李霖泰助理所收集到的剪报等等。剪报的资料主要是记录有关李霖泰的家庭资料、政治生涯、从政时的事迹和退出政坛后的新闻。而所收集到有关书籍主要阐述了李霖泰在行动党的历史事迹、他本身对社会、国家和民生问题的想法，也从中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以下是有关的书籍资料。

1. 李霖泰编撰的《诤言集》（1996），主要收集了他从1991年至1995年间，在华人报章、马来文报章和英文报章所撰写的专栏文章。他编撰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广大人民知道与了解马来西亚人民所享有的公平、合理、自由、平等的权利，仍有许多领域有待大家继续争取、巩固和改善。此外，李霖泰也针对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交通、排水系统及民生等课题作出客观评论。《诤言集》里也记录了许多中下阶级社会所面对的问题。

2. 何豫梁、江振轩编撰的《李霖泰与国民服务言行录》（2003），主要记录了李霖泰在担任国民服务计划理事会主席的事迹与其心声。李霖泰也在书中吐诉担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时，所面对的矛盾与难处。李霖泰担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主要是监督国民服务局的策略，实行国民服务计划的目标，有时候他很想作出改革，但是基于他没有实权的关系

而不能落实，唯有与国民服务局总监商讨。从中也可以探讨李霖泰对青少年、国防与国家发展的担忧和思维。

3. 丘光耀的《超越教条与务实》（2007），以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为研究。这本书记述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成立、发展过程、党的运作、党领袖与党员们的斗争，也阐述了该党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这本书也记录了有关李霖泰在党内的事迹。

4. 李霖泰编撰的 *Melalui Kaca Mata saya* 或英文名为 *Through My eyes*，这本书收集了李霖泰于 2011 年至 2015 年间的专栏文章，主要记载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批判和意见，以作为提醒人民和社会对社会问题的醒觉和关注。从这本书中，可以探讨李霖泰对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也可以探讨他的社会理念。

5. 何启良主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2014），是一本人物传略，录取和撰写马来亚、马来西亚百年间具有社会影响和功绩成就的华人。这本书撰写了李霖泰的生平、他在政治领域的政绩、他对选民的服务以及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

6. *Lee Lam Thye di mana-mana (ahli parlimen yang dedikasi menjalankan tugas sepenuh masa)* 是一位记者（名字不详）在 1985 年撰写有关李霖泰的生平家世、参与政治的历程和担任议员时对人民和社会的贡献。这本

书也记录了李霖泰的政治理念和其不分种族，积极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态度和案例。作者也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些有关李霖泰在下议院对一些法令的辩论。

综合以上的前人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很多有关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人物论述和记录的书籍，只是对李霖泰有概括性的论述和专题式的探讨而已。而由何启良教授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一书对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人物作出较全面和学术的探讨和论述。这本书主要是为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八位领袖立传，可是却没有收录李霖泰的人物篇。何启良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里，虽然有收录了李霖泰的历史，记述他的生平及经历的重大事件，其中也记录了他在政治领域的参与与贡献，但是限于字数，以致并没有全面地记录他在退隐政坛后的服务与贡献。因此，笔者认为李霖泰为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做出的服务、贡献和事迹，应该被记录下来和流传下去，也可以在马来西亚历史上为李霖泰留下文献和记录这位对社会与国家有贡献的社会工作者。故此，本论文将探讨李霖泰的人格特质、他在任内和退隐政坛后的事迹与服务和他的政治与服务的理念，以期填补此项研究不足之处。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是指通过对收集到的某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以探明研究对象性质和状况，并从中引出自己观点。本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法

来进行研究，笔者在华社研究中心、《中国报》资料库和行动党总部的图书馆搜集有关李霖泰的剪报资料和有关书籍。笔者从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筛选、淘汰和归纳，再进行研究与探讨。这些剪报资料，主要集中在李霖泰加入民主行动党、担任国、州议员期间以及退出政坛后转型的各报章报导。这些剪报中，多数属于李霖泰在任内时发表的文告和个人专访，这些资料有助于探讨与了解李霖泰的家世背景和他加入行动党的原因。笔者也从这些资料研究和探讨李霖泰的政治理念、成就、在行动党的事迹和在任内与退隐后的事迹和服务。笔者也曾与李霖泰联络，希望与他进行专访，但由于李霖泰公务繁忙，且时常不在国内，无法接受面谈访问，笔者唯有通过短讯和电邮与他联络，李霖泰则吩咐他的助理以电邮的方式解答笔者提出的问题，以补充文献不足及缺漏之处。此外，笔者也曾访问李霖泰的助理，叶健安¹以获得更多有关李霖泰的资料。

第四节 论文基本框架

本论文分成三章主体内容，另有绪论和结论两部分。绪论包括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动机、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论文基本框架。

第二章为李霖泰的家世与人格特质。主要先介绍李霖泰自小的家庭状况、教育背景、思想和社会理念，再论述其人格特质。

¹叶健安（Yap Khean Ann），李霖泰私人助理。直到2018年，已经当了李霖泰私人助理长达12年。

第三章为李霖泰与政党政治。这章主要探讨李霖泰如何走上政治之路及论述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他对行动党、人民与国家的付出与贡献和交代李霖泰退出政坛的原因。

第四章为李霖泰的社会服务。这个章节论述李霖泰在担任国会议员与行动党领袖时，对选民的服务以及他退出政坛后转型为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服务。

第五章为结论，总结所进行的研究，以让后人能对李霖泰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章 李霖泰的家世与人格特质

第一节 李霖泰的家世背景

李霖泰 Lee Lam Thye 或简称 L.T.Lee，祖籍广东新兴县，于 1946 年 12 月 30 日出生在霹雳州怡保万里望（《南洋商报》，1990 年 10 月 1 日），其父亲（Lee Kan）是一名铁厂工人，而其母亲，蔡凤景（Chooi Fong Keng）则在怡保万里望的菜市场卖菜，他还有一位姐姐，双亲的收入刚好足够他们一家四口过活。由于李霖泰自小家庭贫穷，所以除了上课，他还得帮忙父母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他放学回家后，都会到母亲在家附近开辟的菜园去帮忙耕种和除草的工作（《中国报》，1990 年 10 月 19 日）。此外，每逢学校假期时，他都会到父亲的铁厂去帮忙，因此也养成了勤奋的习惯。²李霖泰是家中的唯一的儿子，虽然父母对他疼爱有加，但是其母亲对他管教严厉。在李霖泰上小学的六年求学时期，即使学校距离家里的路程大概需要三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其母亲坚持每天都亲自送他上学和接他放学，原因是为了不让他有机会和其他同学相约去玩和有机会学坏（《中国报》，1990 年 10 月 19 日）。由于李霖泰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因此她也对自己孩子的纪律也有所要求，这才造就了今天有纪律的他。³

李霖泰完成小学的课程后，母亲便为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让他可以骑自行车到学校去上课（《中国报》，1990 年 10 月 19 日）。李霖泰中学

²叶健安（李霖泰私人助理）电邮；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时间：5:42p.m.。

³叶健安（李霖泰私人助理）电邮；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时间：5:42p.m.。

时期在怡保的圣米高英文学院（英语称为 Saint Michael's Institution, 简称 SMI, 马来语称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aint Micheal）求学，并在那里完成中学的求学生涯（《东方日报》，2007 年 2 月 1 日:A10）。李霖泰在中学时期，他父亲因为年老体衰，不能再工作，那时只有靠着他的母亲在菜市场卖菜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时的李霖泰一放学回家就会去菜市场帮忙看档口，他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念完九号班（即现在的中五）（《通报》，1986 年 6 月 4 日）。李霖泰在兼顾学业和分担家里事务的情况下，学业难免受到影响，所以在学校的成绩平平，没有特别优异的表现（《中国报》，1990 年 10 月 19 日）。虽然李霖泰的家境贫苦，但他母亲坚持让他完成中学课程，最后李霖泰不负母亲所望，完成了中学课程后，也完成了高级剑桥文凭（《中国报》，1990 年 10 月 19 日）。

于 1966 年，李霖泰考获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二等文凭后 (Sijil Pelajar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便在母校圣米高英文学院当了几个月的临教，之后就到一间商行去工作（《星洲日报》，1983 年 12 月 18 日）。那时他在联合机器商店当书记，月薪只有二百元。（《中国报》，1990 年 10 月 19 日）。不过，李霖泰认为商行这份工作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过后他便辞去这份工作，全心投入政治。

其实李霖泰在中学时期已经对政治充满兴趣，加上他是语文学会的会员，故有机会参与学校举办的政治与时事辩论会。当时的他非常关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英文：People's Action Party, 简称 PAP; 马来语：

Parti Tindakan Rakyat) 领袖的言论, 这对他后来的政治路途也有所影响 (《星洲日报》, 1983 年 12 月 18 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领袖李光耀⁴就是李霖泰心目中所崇拜的政治英雄, 尤其是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的卓越成就、领导能力和其治国理念, 对他的影响甚深, 也启蒙了他对政治的理念和兴趣 (《中国报》, 1990 年 10 月 19 日)。李霖泰一直以来都很想接触李光耀, 最后他下定决心写了一封信给李光耀, 表示有意在怡保成立一个新支部 (《中国报》, 1990 年 10 月 19 日)。当他把信件寄出去后, 就在怡保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向他们表明心愿, 并要求他们协助成立人民行动党怡保支部, 很多朋友都愿意支持他 (《中国报》, 1990 年 10 月 19 日)。李光耀在回信中要他与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蒂华•那⁵ (C.V Devan Nair) 联络, 商量有关成立支部的事宜 (《中国报》, 1990 年 10 月 19 日)。最后李霖泰成功与蒂华•那联络, 于 1967 年初在怡保成立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 (简称行动党, Democratic Action

⁴ 李光耀生于新加坡, 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唐溪乡。1940 年至 1950 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和中殿律师学院学习, 1950 年获中殿律师学院律师资格。在英国期间, 受到了费边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影响。1950 年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后, 积极从政, 曾担任律师和几个公会的法律顾问。1954 年 11 月参与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并任秘书长。1955 年当选为立法 (1965 年 12 月改称国会) 议员。1959 年 6 月任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总理。李光耀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于 1963 年 9 月 16 日与沙巴、砂拉越加入联合邦, 但于 1965 年 8 月 9 日东姑阿都拉曼在马来西亚国会宣布与新加坡决裂, 新加坡宣布独立, 新马分家。李光耀任新加坡总理 33 年。1990 年退位, 先后任内阁资政、国务资政, 2011 年大选后退出内阁 (何启良, 2014: 618-620)。

⁵ 蒂凡那是人民行动党的早期领袖之一, 著名的职工会份子, 曾与林清祥等人一同被英政府逮捕下狱。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 蒂凡那与林清祥等人获释。继续从事职工运动, 且与李光耀结成亲密战友。1964 年以马来西亚公民身份, 代表人民行动党角逐孟沙区议席告捷。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 在马来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易名为民主行动党, 蒂凡那出任秘书长, 也是该党在国会内的唯一议员。1969 年大选前, 蒂凡那宣布辞卸民主行动党秘书长, 且表明不再参加大选。他回到新加坡, 重新领导职总, 也在后期成为新加坡国会议员。1981 年被新加坡政府推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统 (谢诗坚, 1984: 93)。

Party(DAP))怡保支会，蒂华•那为新支部主持开幕礼（《中国报》，1990年10月19日）。

李霖泰投身政治除了对政治有兴趣，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动向，他也希望可以透过政治改革社会，改变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政策（《南洋商报》，1986年7月24日）。此外，他的家庭背景也让他体验到贫困人民的需要和所需的帮助，这也成为他积极参政的动力（《南洋商报》，1986年7月24日）。

李霖泰 17 岁便加入行动党（《新明日报》，1990 年 10 月 4 日），于 1967 年成为行动党怡保支部发起人之一后（利亮时，2014:643），在 1968 年，他便从怡保南下吉隆坡，担任全国商业雇员联会的执行秘书。那时李霖泰经常去一位行动党的前秘书长吴福源⁶的绘测所聊天，他就在那里认识了他的太太（《南洋商报》，1986 年 7 月 24 日）。李霖泰和太太叶桂虹，洋名玛莉（Marry Yap Kooi Foong）于 1975 年结婚，并育有二名孩子（利亮时，2014：643）。大儿子李显龙（Lee Hsein Loong），二儿子李显明（Lee Hsein Meng）（《中国报》，2003 年 2 月 9 日）（Metro, 19 Jun 2011）。

⁶ 吴福源曾出任民主行动党副秘书长（1966-1967）、秘书长（1967-1969）及副主席（1971-1972）等要职，乃该党于 1960 年代后半草创之初的重要领导人。短短数年间，即奠定行动党崛起为国内龙头反对党的基础，一度锋芒毕露。惟 1969 年 5 月全国大选后，吴福源因对族群流血冲突后的政治危机处置失措、进退失据，刹时英明失色。1970 年代初，他因涉及多起党内纷扰及党际密谈、跳槽等重大争议，遭党友、选民唾弃，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何启良，2014：1242）。

李霖泰加入行动党后，受到前辈们的看好与提拔。李霖泰于 1969 年大选时，在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吴福源的推荐下代表行动党竞选国州选区，在武吉那那奏凯，可惜在巴生区（Klang）国会议席方面，却以微差败给时任劳工部长马尼卡华沙甘（V.Manickavasagam）（《通报》，1986 年 6 月 4 日）。当时李霖泰才 23 岁，中选为州议员后，勤于服务人民，时时刻刻都准备为人民处理民生问题。他在吉隆坡武吉那那（Bukit Nanas）（1986 年易名为武吉免登, Bukit Bintang）连续蝉联四届，直到隐退政坛。他在担任国会议员时，积极关心和帮助小贩，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因此被冠上“小贩之父”的美誉。

李霖泰的政治理念是不分种族肤色为人民争取福利、积极为人民服务 and 为人民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他曾在《星洲日报》的专访中表示身为人民代议士，他要扮演三项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以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包括有关国家政策与原则的问题为主；第二项就是解决选区内人民所面对的难题；第三项是去改善民生的问题（《星洲日报》，1983 年 12 月 18 日）。因此李霖泰在任职的时期处理与解决了很多民生问题，如非法木屋区问题、申请廉价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反毒活动、为小贩申请执照、申请提出公积金的存款和为穷人申请医药免费治疗等等。

李霖泰在接受访问时曾透露，虽然他在执政时竭尽全力为选民服务，深受选民的爱戴，但是有时候当选民的问题无法被解决时，他便会受到指责，这让他感受到委屈和无奈。其中一个例子是屋主起租高达百分之

百，租客向他求助，但这些事情都是他无法去解决和掌控的。他也透露他出生在一个极贫穷的家庭，所以很了解贫困人家的生活，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正是他和家人过去所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会全力以赴地去帮助他们，这也是他参与政治的原因之一（《星洲日报》，1983年12月18日）。李霖泰也指出当时多数穷人的教育程度不高，也不谙马来文，所以无法亲自到政府部门去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因此他有责任为他们在国会上传达民意，确保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可以为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与福利。

李霖泰非常愿意将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处理人民的问题，他总是保持着他的时间是属于广大群众的时间，甚至牺牲他与家人的相聚的时间和睡眠时间也在所不惜。就好像有好几次他答应带孩子去看电影，但偏偏在那时候有选民上门找他处理事情，最后唯有选择为选民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取消和孩子看戏、享天伦的时间。除此之外，李霖泰也在他的汽车后座放置了一架打字机和多种表格，如：申请公民权表格和申请各种执照的表格等等，这是为了可以更方便和有效地人民填写表格、打信和申请各种执照等（《星洲日报》，1983年12月18日），以便可以更快地帮助人民解决问题。

李霖泰在行动党担任副秘书长和国会议员长达 20 多年，却在 1990 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前夕突然宣布引退。1990 年 9 月 12 日，李霖泰突然宣布辞掉行动党直辖区主席的职位和退党，这消息震惊全国（利亮时，

643)。当时时任行动党主席的林吉祥和党内的一些高层领袖们积极劝李霖泰放弃辞职的念头（中国报，1990 年 9 月 25 日），但是李霖泰却表示自己心意已决，不可能改变决定。李霖泰在宣布辞掉党职的两个星期后，即 1990 年 9 月 29 日作出第二次的惊人宣布，即从当天起正式退出政坛（利亮时，2014：643）。他也辞去行动党副秘书长之职，但保留武吉敏登区国会议员身份，直到国会任期届满为止（利亮时，2014：643）。

退出政坛后，李霖泰并不因此而停止他的理想与目标，他依然积极为人民服务，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工作者。李霖泰担任超过二十个非政府组织要职，是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典型代表人物（利亮时，2014：643）。李霖泰退出政坛后，曾担任实达基金会主席、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 NIOSH) 主席、马来西亚防范罪案基金会（Malaysia Crime Prevention Foundation , MCPF) 副主席、一个马来西亚基金会信托人、马来西亚陆军后备队荣誉上校、国民团结咨询委员会委员、吉隆坡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东姑阿都拉曼基金会信托人、郭氏基金福利顾问和卫生部属下器官捐献教育小组主席（《东方日报》，2007 年 2 月 22 日）。

除此之外，李霖泰在 1992 年至 2005 年也担任了马来西亚全国反毒品滥用协会（Persatuan Mencegah Dadah Malaysia, PEMADAM) 主席，2004 年至 2005 年担任皇家警察提升特别委员会成员，2005 年至 2008 年担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2007 年担任林甘司法丑闻短片 3 人独立调查

小组成员。李霖泰还未退出政党和政坛时，他已经非常关注人权的自由，退出政坛后，他还是依然继续关注和为这事项作出努力。他更在 2000 年至 2002 年成为了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的成员，这与他在参政时积极关心人权的意愿是一样的。

李霖泰不仅担任多项社会工作的职位，他也担任多项企业的职位。直到 2001 年，他担任的挂牌公司职位包括阿马机构董事、森联合产业公司董事、MBM 有限公司董事、第三电视董事和宝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南洋商报》2001 年 4 月 7 日）。

虽然李霖泰投身多项的社会工作，但他却表示会集中火力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全国职业安全及卫生局的业务上，因为他觉得现代劳工的工作安全需要被重视，他也认为全国职业安全及卫生局需要办理更多的专业课程，让雇主明白到劳工的工作安全及提升工作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利亮时，2014：644）。李霖泰在退出政坛后投身服务最久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全国防止滥用毒品协会”，他参加此协会长达十余年之久，他说要实现 2023 年我国成为无毒品的国家，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包括非政府组织，个名族宗教、文化团体、民间团体、教师们、家长们与政府及防毒协会一起配合才能得到真正的效果（《南洋商报》2001 年 4 月 7 日）。

李霖泰多年来积极地为社会与人民服务，深受政府与民众的肯定。在 1995 年获得霹雳州苏丹的赏识，封赐拿督勋衔（《南洋商报》2001 年 4 月 7 日）。于 2002 年获得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勋衔（PSM.SPDK.SMW.DPMP.DPMS.JMN.JP）（利亮时，2014：644）。

第二节 李霖泰的人格特质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认为政治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或者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的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利的分配（2010：199）。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力；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或者，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2010：199）。

马克斯·韦伯亦认为国家是以正当的武力为手段来支配人民或被支配者，而被支配者则必须顺服当权者的权威之下（199）。因此，马克斯·韦伯提出支配的三个正当性根据，其中包括从事政治者的分析、概括与分类。马克斯·韦伯也把从事政治者分类成三种类型，那就是传统式、卡里斯玛型和法制型。

第一种类型的是传统式或被称为“永恒的昨日”的权威。“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也就是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Sitte)。这是旧日家父长(Patriarch) 及家产制领主(Patrimonialfürst) 所施展的“传统型”支配(200)。第二个类型是卡里斯玛(Charisma)或被称为“超凡魅力”，这类型的权威是来自个人身上超凡的恩典之赐(Gnadengabe)。这种权威，来自受支配者对某一个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启示、英雄性的气质或事迹或其他的领袖特质。这个类型的领袖都是被推举出来的，这类型的领袖包括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统治者(Plebisziäre Herrschen)、伟大的群众鼓动者(Demagog)、政党领袖等(200)。第三种是法制型，靠的是人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信任、对于按照合理性方式制定的规则所界定的事务性(sachliche)“职权”的妥当性有其信任(200)。换句话说，人民会去服从合于法规的有职责的执行人员。人们会去接受支配，是因于恐惧和期望，恐惧权力者的报复，而期望得到报偿(韦伯，2004：199)。

在这三种类型当中，李霖泰展现出来的政治领袖的形态可以归纳为第二类，那就是卡里斯玛型(Charisma)的领袖。李霖泰在担任国会议员和行动党领袖时，不辞劳苦，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诉求民意与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他竭尽所能、尽心尽力地为政党奉献与付出和执行自己的责任。因此当时行动党里的党员和广大的人民对李霖泰是抱持着崇拜与服从的态度的。民众对他的信服乃来自他这个人的魅力与特质。李霖泰的人格特质来自他的政治理念，他对自己和代议士都有一定的要求，

他在《诤言集》中提到中选的代议士的职责包括两大点。第一，是要针对国家和州的事件给予建设性的意见，或者是在国会和州议会中提出的重要法律事项，提出言论以探讨。第二，是这些被选出来的代表，都必须为人民服务，所有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都必须易于接近人民（李霖泰，1996：25）。中选的代议士都必须在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地方设立服务中心，以方便为广大的民众服务和给予指导。故，他勤于政务，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与给予帮助。

此外，李霖泰不是依靠着他所拥有的权力和权威来让人民顺从他的。李霖泰的魅力来自他中庸温和的处事态度。无论在服务或在国会上都一律表现出这种态度。前首相属部长尤索诺（Yusof bin Haji Mohd.Noor）曾经表示，“李霖泰在国会辩论课题的良好作风，应成为该党的模范，因为李霖泰具有高尚的道德，不像其他行动党国会议员”（《中国报》，1990年10月1日）。

李霖泰身为反对党领袖，在国会上很多时候为了积极为人民争取福利和反对一些政策而与执政党领袖抱有不同的意见，难免也有正面交锋的时候。但是他在处事待人方面温和有礼，令他成为一位在吉隆坡政府部门中非常“吃得开”的代议士。他与各部门首长都有一定的交往，而各级公务员也喜欢他的中庸作风，因此，他为民服务时，往往取得事半功倍的方便（《中国报》，1990年10月1日）。李霖泰无论在处理小贩买卖摆档、申请执照、申请木屋修理、申请组屋、申请水、电话供应和

处理水灾、火灾或其他天灾等的援助，都得到市政府的特别待遇。所以当他为选民向市政府提出申请时，都比其他政党的领袖更快得到回应与成绩。甚至一些有关市政府惠及人民的工程、设施和计划，他都会先获得有关的消息，然后往往都是由他来宣布，而不是由有关部门的官员来宣布（《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其他政党的领袖在处理民生问题时，有时候会受到有意无意的阻难，他们的申请，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没有下文，也曾被一拖再拖三拖（《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因此，当时的选民也渐渐对李霖泰信心大增，认为他办事效率较高。

在1982年和1986年马来西亚大选的成绩中，国阵得票分别为百分之60.54和百分之57.40，国阵在1982年获得132个席位，而反对党只获得22个席位。在1986年，国阵获得148个席位，而反对党则获得29个席位（见表一和表二）（林水椽，1988：115）。1980年代的马来西亚属于国阵的天下，照理只有执政党的国会议员才会拥有在政府部门有特别的待遇；但是这种情况正好相反，身为反对党的李霖泰却可以在政府机构得到很好的待遇，而身为执政党的领袖反而在这方面大不如李霖泰，这也证明了李霖泰在政治上和领导上拥有他一定的人格魅力。

表一：1982 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各党的国、州议席数目及国会选举得票率

政党	州议席	国会议席	国会得票率
国阵	281	132	60.5%
民行党	12	9	19.6%
回教党	18	5	14.5%
独立候选人	1	8	不详

资料来源：王国璋（1997：137）

表二：1986 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各党的国、州议席数目及国会选举得票率

政党	州议席	国会议席	国会得票率
国阵	299	148	55.8%
民行党	37	24	20.3%
回教党	15	1	15.3%
独立候选人	0	4	3.1%

资料来源：王国璋（1997：140）

李霖泰积极为民服务、争取福利与付出他的时间与精神，他不分种族地关心民生问题和帮广大民众解决他们的问题。他的努力服务是受到大家的瞩目的，就连公务员都认同他的努力，尽力地与他配合，为人民谋求福利。然而广大民众拥戴李霖泰是无可厚非，但是连官员们都一样

拥戴他，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政府机构和国会的官员们最清楚哪一些议员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就连公务员也会厚待李霖泰，可想而知连官员都认同他为民服务的态度。这些官员可说是最了解议员们处理民生问题的过程的人。而他们积极地与李霖泰合作和协助他，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李霖泰可以更顺利与快速地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难题。

一份马来文报章形容，李霖泰是一位中庸的反对党领袖，虽然他在国会里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判，但是他所提出的意见和看法都是在深思熟虑后才发表的，因此，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的成员都非常尊重他。虽然他是一名反对党领袖，但是他与政府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前任吉隆坡市长阿拉亚然（Yacob Latif）和时任吉隆坡市长伊利亚奥马（Elyas Omar）与李霖泰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与一般的反对党领袖非常不同之处（Watan, 2 Oct 1990）。

1987年10月22日，林吉祥遭警方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其他六位行动党领袖加巴星（Karpal Sigh）、陈胜尧、P. 巴都（P.Patto）、刘德琦、V•大卫（David S.Vethamuthu）和林冠英也同时被扣留（《南洋商报》，1988年2月23日）。那个时期可说是行动党面临严峻考验的时期，也是国阵抨击行动党最好的时机。但是却在这期间，连国会秘书处的官员都冒着触犯条例的情况下，帮助李霖泰在国会口头询问的时间有机会发言和提出询问（《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⁷

⁷国会的口头询问的程序是所有准备在国会提出口头询问的问题，必须在国会开会的两个星期前，提呈给国会秘书处；秘书处将把所有的问题，收集成册，编印为一本“小册

李霖泰身为行动党领袖，国会却安排让他发言，在口头询问时间内提出询问。本来这并非是一个问题，但是令人质疑的是当时国会议员翻遍整本“口头询问问题”的小册子时，却没有李霖泰应该在两个星期前提呈给国会秘书处的“问题”（《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国会每天“口头询问”秩序，是预先编印的，全部采用“IBM”打字机打字印刷（《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但是在3月15、16、17和21日，国会发给国会议员的“口头询问”秩序表，却出现奇特的现象，李霖泰发言的编排，频频出现（《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因为程序表上，李霖泰发言的那一节，明显地是改用电脑打字机打出的，而不是原来的“IBM”打字机打出来的（《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李霖泰於3月15、16、17和21日在国会口头询问时间内，获得的发言机会和提出的时间，完全出乎很多国会议员的意料之外。李霖泰不仅在政府部门得到很好的帮助，即使在国会上也得到秘书处的帮助。这是李霖泰的魅力所在。

不仅如此，李霖泰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凡事亲力亲为，尽自己所能为人民解决问题，因此深受人民的尊重与爱戴。一位市民，张佑记海味的店东主张炳佑指出他在半山芭（Pudu）营业的七年中，李霖泰给他的印象是不分肤色及贵贱的为民奔波，解决难题的领袖

子”，分发给部长，议员参考。等到国会开会期间，秘书处每天都会编排国会议员发言的先后秩序，让议员在口头询问时间内，提出询问，并由有关部长或副部长作答。由于作答的时间有限，一般上只会编排前十名至年内的议员，才有机会起立作出口头询问（《大众报》，1988年3月28日）。

（《中国报》，1990 年 10 月 1 日）。由此可见，李霖泰当年可以蝉联四届武吉敏登区国会议员，並以最多票胜出，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李霖泰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每当人民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寻求李霖泰的帮忙，一定可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李霖泰是一位不论大小事情都愿意帮助市民的人民代议士。1986 年，有一位市民建于半山芭后巷的住家遭火吞噬，当时李霖泰不辞劳苦地帮助她重建家园；所以她十分感谢李霖泰的协助。此外，一名在半山芭卖菜超过 20 年巫裔小贩形容李霖泰为人友善，而且会时常到半山芭菜市场巡视。他也指出李霖泰不只关心与帮助华族，也不分种族地去为民服务。李霖泰所做出的贡献，已经在人民的心中塑造成英雄的形象，也有“超人议员”的称号（UM, 28 March 1995），这些种种都是李霖泰独有的超凡人格魅力，在政治上散发出不一样的气质与特质。

李霖泰的成长过程与所受的教育，对他的人格塑造有一定的影响。他受到父母亲的影响，引导他勤奋向上和做任何事都要都纪律，包括对自身的要求。他家庭的经济状况较差，也促使他了解地下层人民的辛苦与无奈，使他在政治上体恤贫苦人民的困难和帮助他们。

由于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政治的因素，英语成为那时候的国际语言，在商业上有一定的价值。在英殖民时期，英国人积极地在马来西亚开办了很多以英语为主流的学校，那时候只要懂得英语的人，

都会有高人一等的待遇，甚至有更多的就业就会。相信这个社会公式深深地影响了李霖泰的父母，因此让他受英文教育，以便他日后会有更多和更好的就业机会。⁸李霖泰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受英文教育的，这个教育背景也巩固了他的自身理念和其社会理念，他的社会理想理念是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平等的在社会。他曾经表示自己比较偏向社会主义，认为行动党的理念比较适合他（《大众报》，1986年19月6日）。

⁸叶健安（Yap Khean Ann）（李霖泰私人助理）电邮；日期：2017年11月20日；时间：5:42p.m.。

第三章李霖泰与政党政治

第一节 李霖泰与民主行动党

李霖泰选择加入行动党，主要原因是它是一个以种族平等，社会及经济公平、国会民主制度及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为基础的政党。民主行动党的成立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着密切的关系。⁹当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没有领袖带领的情况之下，重新申请注册为一个新的政党，以延续人民行动党的使命和目标。因此，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便诞生了。它不仅延续了人民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目标，也为各族人民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作出努力。由此观之，民主行动党的成立与马来西亚的成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了解行动党的成立，则必须了解马来西亚成立的背景。

马来西亚这个概念是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于 1961 年 5 月 27 日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为他设宴时提出的概念（廖文辉，2017：332）。他认为马来亚、沙巴、新加坡、砂拉越和汶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很多共同点，未来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合作（谢诗坚，1984：80）。这些地区都与英国有联系，推行英国式的行政和法律，也与英国进行大部分的贸易。后来因为与汶莱的条

⁹人民行动党的主要创办人有李光耀和杜进才等人。人民行动党于 1959 年时已是新加坡的执政党。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后，便涉入半岛政治，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诉求与当时的联盟关系逐渐恶劣。1965 年，新马分家，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党员将其改名为民主行动党。（王国璋，1997：209）

件谈不拢，¹⁰乃至汶莱未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东姑阿都拉曼的马来西亚联邦的意愿是将其他地区纳为州，然后由吉隆坡的中央政府管治，带动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正式摆脱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分（谢诗坚，1984：80）。¹¹

马来亚国会于1961年10月通过与接受马来西亚这个概念（谢诗坚，1984：83）。同年的11月，东姑阿都拉曼前往英国与时任首相的麦米伦（Maurice Harold Macmillan）商谈马来西亚计划，双方达成协议。1962年5月，李光耀也到伦敦去与麦米伦见面会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事项。李光耀坚持新加坡若要加入马来西亚，就必须拥有自主劳工和教育的权力为条件。然而，新加坡的两个政党都持有不同的立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而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¹²（以下简称为社阵）（英语，马来语：Barisan Sosialis）则强烈反对这个计划。

¹⁰1962年12月汶莱发生叛乱，汶莱是英国的保护区，不是殖民地，因此马来亚政府不能像对待砂拉越和沙巴那样，介入他们与反对力量对抗。因此，东姑阿都拉曼与汶莱苏丹的商谈终告失败。汶莱的叛变是由人民党的阿查哈利带领的，当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时，他便要成立一个以汶莱作为中心，联合砂拉越和沙巴的北婆三邦独立国，但是他的计划却不得文莱苏丹的支持，砂拉越和沙巴的马来人不信任他。他于1962年12月8日，展开了革命行动，当时他身在马尼拉，宣称要建立一个北加里曼丹国。汶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封闭人民党，五天之内，英军平定了叛乱，汶莱恢复了原本的面貌（谢诗坚，1984：85）。

¹¹东姑阿都拉曼希望沙巴和砂拉越加入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的目的是为了在种族比例上可以抵消华人占大多数的局面。他认为这样的安排比较容易被马来亚政府所接受，也可以捍卫以马来人为基础的马来西亚宪法（谢诗坚，1984：81）。

¹²1961年7月26日，林清祥带领人民行动党51个支部的35个支部，以及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党员退出人民行动党，并成立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由李紹祖担任主席，林清祥担任秘书长。

李光耀于 1962 年 9 月 1 日，靠全民公投¹³而非大选的方式寻求新加坡人民对合并方式的认同（丘光耀，2007：64）。该公投结果百分之 71 的新加坡人民支持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经过一番的争取¹⁴后，马来西亚最终于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

虽然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对马来西亚成立的理念有别，但是人民行动党为了与全国巫人统一机构（英语：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 UMNO）¹⁵保持良好的关系，时任主席杜进才在出席 1964 年 4 月 25 日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时，表示人民行动党参与该大选不是为了与巫统对抗，而是为了制止社阵的崛起，因为社阵反对新加坡合组马来西亚，而且还倾向印尼共产党，担心选民会将选票投给社阵（谢诗坚，1984：92）。人民行动党在国会派出 11 名候选人，其中两人因与巫统对垒，所以宣布不与巫统争夺而退出，最后只剩下九名候选人与马

¹³ 公投给予人民三项选择，那就是（一）新加坡拥有教育、劳工自主权的白皮书宪制部署；（二）根据联合邦十一州同等待遇，作为一个州的完全及无条件合并；（三）在不逊于婆罗洲三邦的条件下加入马来西亚（丘光耀，2007：64）。社阵猛烈攻击李光耀的公投是误导性的，因为三项选择都是建立在假设人民同意合并的基础上，而没有给予人民反对的选项，所以社阵唯有号召人民投“空白票”以示抗议，然李光耀却宣称空白票当作赞成票，公投结果百分之 71 的人民支持第一项，空白票占了百分之 25，其余的百分之四的选票没有记录（丘光耀，2007：64）。

¹⁴ 除了新加坡之外，沙巴和砂拉越的一些政党对成立马来西亚意见掺半，有些支持，有些反对。经过洽谈与了解，最后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同意合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成立的计划除了受到内部的反对，亦受到外来势力的反对，包括来自中国、苏联、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谢诗坚，1984：83）。

¹⁵ 全国巫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简称巫统），于 1946 年 5 月 11 日由拿督翁（Datuk Onn Jaafar）创立，是当时半岛上数十个马来团体为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共同组织而成的。1987 年因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发生严重的分裂，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另组 46 精神党，但于 1996 年又率该党回归巫统（王国璋，1997：207）。

华和社阵的候选人角逐（谢诗坚，1984：92）。¹⁶人民行动党做出的这项决定，并没有因此而与巫统的关系变得更密切。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不到一年，于1964年7月，在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当时的执政党巫统要建立一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这与李光耀加入马来西亚的意愿有别，所以李光耀通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¹⁷（简称团总，英文称为 **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团结马来西亚各地的非马来人和马来人，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李光耀，2000：2）。过后，人民行动党继续展开斗争，加上其他的因素，才与巫统的关系逐渐恶化。¹⁸新加坡最终于1965年8月9日正式退出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谢诗坚，1984：119）。

1965年8月9日中午十二时，李光耀在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举行记者会，情绪激动地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

¹⁶由于当时马来西亚的华人对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未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与信任，于是便将手中的一票投给了联盟（英语：**Alliance**；马来语：**Perikatan**）和社阵；因此人民行动党在该次的大选中，唯一中选的只有孟沙区（**Bangsar**）的蒂凡那（谢诗坚，1984：93）。马华与巫统的联盟是于1953年8月23日成立，并于次年选出三名代表，共同组成联盟最高执行理事会。代表印人的印度国大党较后加入，形成华巫印的联盟，直到1969年5月13日，发生族群冲突事件（也称为513）为止（祝家华，1994：51）。

¹⁷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于1965年5月9日，在吉隆坡成立，参加会议的有人民行动党（杜进才、王邦文、奥斯曼渥、李炯才和巴克代表），砂拉越马真达党，**Party Machinda**（梁浩然和M布马代表），人民联合党（杨国斯和马利干沙礼代表），民主联合党（林苍佑和阿都华合代表），及人民进步党（**D.R. Seenivasagam**），在会议上签署了一份宣言，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其宣阐述：“全体签署者意识来自国外对马来西亚的威胁，同时也深切关注到国内外因意见不和所造成的分裂，因此应该组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以便号召人民面对这两个威胁”（谢诗坚，1984：117-118）。

¹⁸巫统认为人民行动党有意挑战联盟执政权，并于1965年在吉隆坡举行的大会上谴责人民行动党，并要求中央政府采取行动对付人民行动党和李光耀（谢诗坚，1984：119）。基于各种的政治因素与巫统施予的压力，东姑阿都拉曼认为当时只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那就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人民行动党，或者是与新加坡切断一切的关系。最后他决定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国家（丘光耀，2007：84）。那时还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支部党员大约有一千七百名，为此感到茫然。然而，在新加坡宣布独立的同一天，该党派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到芙蓉支部、奥斯曼•渥（Othman Bin Wok）则到马六甲支部举行汇报会（丘光耀，2007：85）。8月11日，马来西亚半岛（Peninsular Malaysia）人民行动党的代表人，吉隆坡孟沙区国会议员蒂凡•那（Devan Nair）到新加坡参与马新人民行动党领袖会议。会后杜进才以党主席的身份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加坡完全退出马来西亚的政坛，无意以政府的身份来干预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他表示将会给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亚人民行动党组织提供援助（丘光耀，2007：85），同时也宣布蒂凡•那将会带领马来西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所有支部。

在1965年8月14日，马来亚人民行动党（PAP Malaya）公布了全国委员会名单。主席是曾敏兴医生、副主席是吴福源、秘书长是蒂凡•那、副秘书长是DP查维尔（D.P.Xavier）财政是S•西华勒南（S.Severatnam）医生，以及五名委员：再因•阿查哈里（Zain Azahari）、陈竞生、康再发、陈崇美和杜志昌。蒂凡•那同时也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但是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却以“马来亚人民行动党是在马来亚申请注册的一个新加坡组织，即使在马新分家后依然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联系”为由，而要求该党解释不应该被吊销党之注册的理由（丘光耀，2007：86）。

同年的 9 月 9 日，马来西亚注册局正式吊销马来亚人民行动党的注册。蒂凡•那在 9 月 10 日以成立一个由马来西亚人民所组织以及为马来西亚人民而服务的政党再次提出申请。可是注册局却以有另一个同样名字的组织在 9 月 9 日的注册已经被吊销为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经过该党的发起人以七十五分钟的时间，决定将人民行动党改名为民主行动党，根据刘德琦¹⁹的口述，将党徽由“闪电”改为“火箭”²⁰的意念是出自吴福源，当时的构思是将人民行动党往下劈的“闪电”倒转，让“它”往上冲，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往上冲呢，他们遂想到了“火箭”（丘光耀，2007：87）。

接着，蒂凡•那也修改了拟议中的党章，加入允许设立筹备委员会的条文，并在 10 月 10 日提交给注册局提出申请。社团注册局在 1966 年 2 月 3 日作出答复，拒绝给予批准注册，理由是“有关申请违反甫通过的《1966 年社团注册法令》”。联盟于 1965 年 12 月，在国会迅速通过一项新的社团注册法令，其中一项条文是不允许政党的党员籍中有所谓“有权投票党员”和“无权投票党员”之区分，目的不外是针对人民行动党党章有“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的条款设置（丘光耀，2007：88）。为此，蒂凡•那再次地修改党章，将原有的“普通党员”和“干部

¹⁹ 刘德琦祖籍广西容县松山乡沙田村，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州蒲种，是民主行动党创党人之一，曾担任行动党中委、霹雳州党主席、霹雳州立法议会反对党领袖，雪兰莪广西会馆副主席。（2017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wapbaike.baidu.com）。

²⁰ 1960 年代末，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宇航火箭是最尖端的新科技，代表现代化动力，这就是火箭党徽又来的典故。民主行动党党徽的意义：红色代表火箭象征该党创造一个现代化、具动力及进步社会的抱负；四个升压机代表马来西亚四大民族对行动党目标所给予的支持；蓝色圆圈代表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白色背景则代表清廉（丘光耀，2007：87）。

党员”换成“永久党员”和“普通党员”两大类。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最终在1966年3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与正式成立（丘光耀，2007：88）。该党成立时，曾敏兴为主席，蒂凡·那则为秘书长，他从1966年3月任职至1967年7月（民主行动党，1991：2）。

民主行动党延续了人民行动党的理念，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平等，马来西亚是属于全民的马来西亚，而不是由任何单一民族所主导的马来西亚（陆兆福：16）。《文良港宣言》（The Setapak Declaration）更清楚与明确地阐明了行动党的意念与目标。1967年7月29日，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体支部执委在吉隆坡文良港（Setapak）集会，通过了一项党的基本政策及原则——《文良港宣言》（丘光耀，2007：91）。

《文良港宣言》的主要内容是：

“民主行动党坚定地信仰一个以种族平等，社会及经济公平及（以）国会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马来西亚理想。我们相信可以推动占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人民的支持，以便达到这项目标，我们认为赢取这项支持是我们的基本目标。我们明白在追求这项目标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到阻碍，不仅是来自联盟党及政府方面，同时也包括来自受外来意识形态及力量所影响及敌视马来西亚的政治力量。我们重申民主行动党立意接受真正的马来西亚理念为导向，绝不受任何的势力，不论是来自反动及民族性的右派，

或受到外国所鼓舞的反马来西亚的左派影响，而乖离我们的方向。

为着要达到我们的基本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一个多元民族社会里的建国过程中取得成功，而联盟政府却偏偏在最重要的过程中，犯下了严重及可耻的背叛国家信誉的罪行。”（转引自丘光耀，2007：91-92）

这就是行动党抱持的民主与自由的意识。

行动党的成立和其政治理念，吸引了许多拥有同样政治理念和抱负的人加入，李霖泰就是其中的一个。李霖泰加入行动党后，便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李霖泰在行动党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是党内重要的领袖之一。1986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过后，李霖泰在党内的地位获得进一步加强，由于行动党获得辉煌的战绩，赢取24个国会议席和37个州议席，逐成立选区服务委员会，并由李霖泰担任委员会主席（《中国报》，1990年10月29日）。李霖泰担任这个执委后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党内的基层和其他党员。这个委员会对中选的行动党议员，起着积极的监督作用。这个委员会规定每位中选的州议员，必须在他们的选区内设立最少一个服务中心，国会议员则必须设立四个服务中心，为选民服务（《中国报》，1990年10月29日）。李霖泰当时必须经常到全马各地去监督中选的国州议员，确保他们有履行自己的责任，这些议员们也需要每个月向李霖泰报告他们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让李霖泰可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势力的机会，但是这项计划最终宣告失败。

丘光耀对李霖泰的形容与其政治生涯作了以下的整理：“李霖泰在党内的地位也是扶摇直上，平步青云的。自林吉祥担任秘书长后，李霖泰在第三届中委会（1971-1974）就从林吉祥手中接任全国组织秘书一职，直至第五届中委会（1977-1979）才转任政治教育局主任。李霖泰自第六届中委会（1979-1982）开始出任副秘书长，晋升到权力的最核心。第七届（1982-1985）和第八届中委会（1985-1988），他继续蝉联该职。1987年10月爆发“茅草行动”，林吉祥在《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下第二度被捕入狱，多位党中委也被关押，李霖泰获临危授命，担任代秘书长。在李霖泰代秘书长期间，传媒探悉李霖泰因营救被扣留的同志不力而面对党内批评，甚至引起党的分裂，不满他的领袖正准备在1988年4月16日及17日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党大中“反李”，林吉祥知悉后，特在同年4月1日公开声明自己对李霖泰的信任，还交代党内的每一位党员都要全力支持李霖泰，给予他全面的配合，解决和处理党内外的事务（丘光耀，2007：273-274）。由此可见，林吉祥非常器重和信任李霖泰。

虽然李霖泰在行动党的权力仅在林吉祥之下，但是他在党内的势力并不强大，他曾经在三年一度的党选中，在15名中选的中委中，得票排名第13（《中国报》，1990年10月29日）。最后因为与党内的一些领袖无法合作与相处下，李霖泰在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候退出行动党和退隐政坛。

第二节 李霖泰的政治成就

李霖泰在中学求学时期已经对政治深感兴趣，当行动党在 1966 年宣布成立后，他便加入行动党，也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李霖泰的政治基础开始于工人运动，他在 1968 年就南下到首都吉隆坡担任“商业雇员职工会”的执行秘书（丘光耀，2007：272），之后便完全投身在政治。

李霖泰在民主行动党里非常受到器重，在 1969 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时被党秘书长吴福源推荐代表行动党攻打武吉那那（Bukit Nanas）州议席及巴生（Klang）国会议席。李霖泰在该次大选中成功赢得吉隆坡武吉那那的州议席，成为武吉那那州议员。那时他才 23 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州议员。同一时间，在巴生国会议席一战中，他以数百票微差败给印度国大党的候选人，也是当时的劳工部长马尼卡华沙甘（V.Manickavasagam）（利亮时，2014：634）。

李霖泰于 1974 年大选，转换跑道参选吉隆坡市区国会议员与国民阵线（简称国阵，Barisan Nasional(BN)）李裕隆对垒（利亮时，2014：634）。虽然 1974 年大选时，反对党的士气相当低落，但是李霖泰却成功击败李裕隆，当选为当时吉隆坡武吉那那的国会议员。自此以后吉隆坡市区便成为行动党最稳固的选区。在 1978 年、1982 年及 1986 年（吉隆坡市区易名为武吉免登区（Bukit Bintang））三次全国大选中，他都成功击退挑战者（利亮时，634）。自 1974 年开始，李霖泰就一直连续蝉联四

届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直到 1990 年他离开行动党及退出政坛为止。从表三可以看到李霖泰和其他候选人于 1974 年至 1986 年，在吉隆坡市区和武吉免登区的大选成绩与得票率。

表三：吉隆坡市区和划分后的武吉免登区选区成绩

年份	候选人	票数	得票率
1974	李霖泰（行动党）	15, 112	64. 4%
	李裕隆（国阵）	6, 490	27. 6%
	杨德才（正义）	1, 540	6. 5%
1978	李霖泰（行动党）	29, 567	78. 3%
	陈文金（国阵）	7, 853	20. 7%
1982	李霖泰（行动党）	30, 854	71. 4%
	黄循营（国阵）	12, 023	27. 8%
1986	李霖泰（行动党）	37, 393	83. 3%
	叶福兴（国阵）	7, 248	16. 1%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1990 年 10 月 1 日。

吉隆坡的武吉免登区是李霖泰的堡垒区，自从 1969 年中选后，就一直蝉联，直到 1990 年。在 1969 年至 1986 年间，其他政党的候选人都无法在武吉免登中选，主要的原因是来自李霖泰的服务与他的人格魅力。自 1970 年，李霖泰担任吉隆坡市区国会议员和行动党的副秘书长期间，他便积极地帮助选区的选民。他的服务态度与宗旨是凡事亲力亲为，尽

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与谋取福利。他非常关注中下层阶级的民众所面对的问题，也积极为他们解决问题，可说是有求必应。

在李霖泰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也积极关心小贩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极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阻止执法官员无理对待小贩和为他们申请营业执照等等，因此被冠上“小贩之父”的美誉。此外，小贩们对李霖泰的感谢可以从“李霖泰菜市场”窥见，该座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菜市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由此可见他在小贩及吉隆坡市民心目中的地位（利亮时，2014:643）。

李霖泰在政治上得到不少好评，可从他蝉联四届武吉免登的国会议员的政绩看出他深受民众的爱戴。在他从政时期也获得政府的尊重。然而，李霖泰最终于 1990 年退出行动党和退隐政坛，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点。

第三节 李霖泰退出行动党和退隐政坛的原因

由于李霖泰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交代自己辞呈的原因，因此外界一直流传着各种有关李霖泰引退的揣测和传言。笔者总结当时可能导致他引退政坛的五个原因，第一个是有关行动党与 46 精神党合作一事。

1990年10月大选前夕，为了避免在大选中出现多角混乱的局面，46精神马来人党²¹（简称46精神党，马来语：Parti Melayu Semangat 46，缩写：S46）、行动党、人民党²²（马来语：Parti Rakyat Malaysia，简称：PRM）、泛马印度人进步阵线²³（英语：All Malaysia Indian Progressive Front，简称印人进步阵线）和马来西亚团结党（Malaysian Solidarity Party）组织一个人民阵线（Gagasan Rakyat）（孙和声等，2007：71）。此外，46精神党也与回教党、回教阵线党（Berjasa）及哈民党（Hamin）组成“回教徒团结阵线（Angkatan Perpaduan Ummah，简称：APU、Angkatan 或回阵）（孙和声等，2007：71）。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bin Tengku Hamzah）横跨两个阵线，从中协调，他们间接合并成为反对党联合阵线（简称反阵）（王国璋，1997：168）。

当行动党与46精神党等结盟时，李霖泰曾经强烈反对将直辖区内的两个国会选区让给盟友，可是行动党领袖层为了实现两线制目标，便把直辖区内的峇都（Batu）选区让给人民党的赛胡欣阿里（Syed Husin Ali），而蒂蒂旺沙（Titiwangsa）选区则让给46精神党的拿督哈仑（Dato' Seri Harun Bin Haji Idris），这使到李霖泰非常不满（《中国报》1990年9

²¹46精神党成立于1988年6月，解散于1996年。46精神党以强调1946年巫统成立时的精神及正统为名。46精神党是由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bin Tengku Hamzah）于1987年党争中失利后而组织的。1990年大选前参与回教徒团结阵线及人民阵线的方式，促成了反对党第一次形式上的大结盟。1996年巫统党庆后，拉沙里将该党解散并率众重返巫统（王国璋，1997：219）。

²²人民党原称人民社会主义党，1990年在吉隆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决定去掉党名中的社会主义字眼，成为人民党。此外，也修改了该党党章的理想与目标，使其更开放而有利于展开组织工作。人民党虽然是个以马来人为基础的政党，但是却坚持非族群政治思想（王国璋，1997：168）。

²³1988年12月国大党时任主席的Samy Vellu和其时任副主席的Pandithan内部不和与对峙后，Pandithan被开出党籍。于是Pandithan于1990年9月成立了印人进步阵线（王国璋，1997：168）。

月 25 日)。正当行动党和 46 精神党联合组成人民力量阵线备受看好之时，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李霖泰先辞去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再宣布退出政坛和退出行动党，令行动党大受打击。因此传闻李霖泰因不满行动党与 46 精神党合作，而退出行动党。

对于李霖泰不满行动党与 46 精神党合作一事，林吉祥在 9 月 24 日发表文告，表示在茅草行动那段时期，是李霖泰缔造了行动党与 46 精神党的合作，提供了两线制一个很好的基础（《南洋商报》，1990 年 9 月 25 日）。李霖泰曾经发表赞同两党合作，他希望有一天，所有反对党和反对势力都能够结合起来，维护民主。他也指出只要能够为了行动党的目标，给予支持和协助，以捍卫民主，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宪法赋予各种族的权益，都可以与那党合作，这也说明了李霖泰没有不满行动党与 46 精神党的合作（《星洲日报》，1989 年 5 月 10 日）。因此，行动党与 46 精神党合作一事并不是导致李霖泰引退的真正原因。

第二种说法是指李霖泰不满意华教人士刚加入行动党便立刻身居高职（《中国报》1990 年 9 月 25 日），而累积了他心中的不满。这些华团领袖如林晃升和柯嘉逊等人，在 1987 年“茅草行动”²⁴中被捕入狱，与

²⁴茅草行动的发生源自华小高职风波。华小高职风波就是指教育部决定在 1987 年 8 月开始，派遣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出任华文小学行政高职事件。这件事原本是不敏感的教育部指令，但向来华小处于要被改制成国小的隐忧困扰（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 条 2 项，教育部长有权力将华小改制成国小），这个指令引起华社的担忧，所以华社决定坚持反对教育部的决定，要教育部收回有关的行政命令。但是时任教育部长的安华依不拉欣（Anwar Ibrahim）不采纳华社的意见，坚决执行这项派遣。因此，马华、民政和行动党在全国十五华团行动委员会的带领下，决定在 1987 年 10 月 11 日在吉隆坡的天后宫举行抗议，限定教育部在同年 10 月 14 日之前解决华小高职事件，不然就罢课。巫统青年团对于马华和民政参与抗议而感到不满，认为华人要团结起来对抗马来人，巫青团于 10 月

林吉祥、林冠英及卡巴星等人，在狱中建立了友谊（孙和声等，2007：71）。出狱后，林晃升、柯嘉逊和一批华团人士，共 27 人决定为实践“两线制”²⁵的政治理想而加入了行动党（孙和声等，2007：71），这是第二个触发李霖泰引退的原因。

第三种说法是指李霖泰对行动党的政策和政治目标问题上与行动党的领导层意见分歧，才退党的。林吉祥认为这种说法诋毁了李霖泰，因为这样间接中是指李霖泰在与行动党一起斗争了 23 年后，还是不相信行动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南洋商报》，1990 年 10 月 4 日）。

林吉祥也在媒体中作出回应：

“我跟霖泰的四次见面及几次的电话交谈中（即在 9 月 19 日至 29 日之间），我们讨论了他认为自己是直辖区行动党内部一项诋毁运动的对象的想法。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什么政策或原则的分歧。我坚信，霖泰从来就没有在政策或原则的问题跟党领导层的意见分歧。我相信霖泰还是相信他献身了二十三年的政治斗争目标，而这正是

17 日在吉隆坡召集千人大集会，紧接着巫统中央宣布于 11 月 1 日在吉隆坡的默迪卡体育场举行 50 万人的党 41 周年大聚会。这使到华巫两族形成紧张的局面。恰巧于 10 月 18 日深夜，吉隆坡发生了一个逃兵开枪误杀一人伤二人的事件，这更使到紧张气氛升高，于是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 10 月 27 日运用内部安全法令进行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先后扣留了 106 名反对党领袖、华教人士、学术人员、环保人士、职工会人员、教会工作者、几位马华和民政的领袖以及一些巫统党员等。英文的星报、星洲日报和祖国报（Watan）被禁，直到 1988 年 3 月 16 日才获准复刊。（祝家华，1994：166-168）。

²⁵两个阵线的概念是时任华团民权委员会署理主席的林晃升在〈两个阵线制度与马来西亚民主〉研讨会中指出，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提倡的两个阵线的概念，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健全地发展。只有形成两个足以互相取代的真现实，当权一方才会表现得更民主，更加开明，人民的意愿才会更加受尊重（祝家华，1994：158）。

我竭尽所能劝服霖泰改变主意的其中一个原因。”（《南洋商报》，1990年10月4日）。

此外，外界也谣传李霖泰是被林吉祥逼走的，而且已经策划了三年。不仅如此，李霖泰与行动党领导层的关系决裂的原因是行动党的领袖多数都是极端主义，而李霖泰则是属于温和派的。为此，林吉祥也作出了澄清，指在政策与原则的问题上，行动党领导层，包括李霖泰在内，都是一致的，而李霖泰是行动党政策与原则的最佳发言人。虽然他和李霖泰的政治作风确实有点不同，可是，这并非如时任新闻部长的莫哈默拉末（Mohd Rahmat）所说，李霖泰的辞职显示其他行动党领袖走强硬的斗争路线，而无法合作（《南洋商报》，1990年10月4日）。

林吉祥在1987年10月爆发的茅草行动中被捕，在那期间李霖泰担任代秘书长一职，那时候他被党内的一些党员批评营救被扣留的同志不力。这些不满李霖泰的领袖准备在1988年4月16日及17日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反他，林吉祥知道后，特在1988年4月1日在监狱中写信给这些领袖们（丘光耀，2007：273）。信的内容主要是交代全国、州和支部都给予李霖泰和党领袖大力的支持。他也指出虽然李霖泰与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见解和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他对李霖泰有十足的信心。

林吉祥力挺李霖泰，导致党代表和观察员在党大期间所展示的大团结是意义深长、历史性和前所未有的事，及时遏制了“反李”浪潮（丘光耀，2007：274）。党选后，林、李二人依旧在第九届中委会（1988-1991）中执掌党的正、副秘书长，李霖泰的代秘书长职务也一直担任到林吉祥在1989年4月19日出狱为止（丘光耀，2007：274）。虽然林吉祥和李霖泰的政治形象和风格截然不同，但是林吉祥还是给予李霖泰最大的支持与肯定，这说明了不是林吉祥逼走李霖泰的。

第四个说法是有关蕉赖（Cheras）收费站万人示威事件是李霖泰辞去州委会主席和退出政坛的导火线之一。1990年9月7日，蕉赖路各个住宅花园的居民涌到蕉赖收费站旁举行万人大示威，抗议政府允许私营公司在住宅区设立大道收费站，当晚民众的抗议声势浩大，警方使用暴力殴打及驱逐群众，并在现场逮捕了48人（丘光耀，2007：275）。1990年9月8日凌晨5时半，时任新街场（Sungai Besi, 后改称蕉赖区，Cheras）行动党籍国会议员的陈国伟²⁶、林玉基（李霖泰的助理）和王亚枝三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拘押（《中国报》，1990年9月25日）。

9月10日，李霖泰向媒体表示，蕉赖收费站的问题不应该引起种族问题，人民不满政府实施收费，并不是某一族群的意愿而已，既然蕉赖

²⁶陈国伟曾担任行动党直辖区州委会秘书，也是李霖泰的前政治秘书，一般人称李霖泰和陈国伟为师徒关系。陈国伟在1986年的大选中首次中选为新街场区（Sungai Besi, 后改称蕉赖区）的国会议员（丘光耀，2007：276）。

收费站引起全民的不满，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尽快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

（《南洋商报》，1990年9月11日）。当天晚上，李霖泰以州委会主席身份在新街场行动党服务中心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争取释放被捕的同志和准备在9月15日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反蕉赖收费站座谈会（《中国报》，1990年9月26日）。当晚迟到的州委会成员余纪桦、曾明新和陈锦德，因不满李霖泰没有重视他们欲提出他们三人被警方传召录取口供的事项，而离席抗议，李霖泰觉得他们不尊敬他，也退席抗议，会议最终不欢而散（《中国报》，1990年9月26日）。

9月12日，李霖泰把辞去联邦直辖区州委会主席的辞职信交给州委会秘书饶桂美，两天后，州委会署理主席廖金华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促李霖泰收回辞职信。陈国伟于1990年9月15日获释，随即召开一场行动党党内检讨会议，李霖泰再次受到基层党员的批评，指他在营救同志方面不够积极，甚至指责李霖泰在蕉赖收费站事件中所持的立场与党的立场相抵触（《中国报》，1990年9月25日）。有传言指李霖泰主张收费减半，而行动党基层则要求政府取消收费站收费。面对这种种的指责，李霖泰终于在9月19日回函州委会，表示不可能撤回辞职信（《中国报》，1990年9月25日）。他也公开澄清，关于蕉赖收费站的风波，他和行动党的立场是一致的，坚持要政府取消收费站收费，而不是主张只减收过路费，避免加重市民的生活负担，同时他也表明自己绝对不是因为此事而辞职的（《星洲日报》，1990年9月25日）。除了收费站事

件，他也表明自己并不是因为华教人士加入行动党而不满，才辞职的（《中国报》，1990年9月28日）。

随后，林吉祥对李霖泰辞职作出公开回应，指李霖泰没有好好处理蕉赖收费站课题的任何指责和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李霖泰在蕉赖收费站课题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以致内阁宣布立刻暂停收费和释放五位在《内案法令》下被扣留的党员（《中国报》，1990年9月25日）。林吉祥也曾经跟李霖泰商讨过他有意辞掉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主席一职之事，他会继续劝阻李霖泰，促使他打消辞意（《中国报》，1990年9月25日）。

李霖泰在9月26日发表文告说自己担任党直辖区主席14年了，既然不能控制整个州委会的党务，却让年轻一辈虎视眈眈这个职权。他希望年轻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在处理任何事务时都要有道德，不要口是心非，待人接物要饮水思源，千万不要忘本。他也劝告那些千方百计要取代他的地位的人，要忠诚，不要使别人成为代罪羔羊（《通报》，1990年9月26日）。到底李霖泰指的这个人是何人，外界揣测李霖泰指的这个人就是陈国伟，但是没有确实的答案（丘光耀，2007：277）。陈国伟针对《马来西亚前锋报》报导说他是李霖泰展开破坏行动的其中一个领袖做出反驳，他说他与李霖泰之间并没有不和，也没有任何的芥蒂，他认为李霖泰在直辖区的地位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南洋商报》，1990年9月27日）。陈国伟也针对李霖泰的辞职一事发表，说在联邦直辖区

内，并没有人直接或间接与李霖泰作对，但是在开会时，有人提出批评是无可避免的，他也指出这件事并没有涉及党内的斗争（《星洲日报》，1990年9月25日）。

9月27日，李霖泰又对外发表，说那些指他与林吉祥政见分歧而使他辞职的报导和传言都是行动党的敌对党所做出的谣言，目的是为了分裂行动党的合作。他促请全体民主行动党党员，不要受到这些企图和恶意谣言所影响（《南洋商报》，1990年9月28日）。他呼吁党员们要更加团结，全力支持秘书长林吉祥。李霖泰的这项交代，也打破了他与林吉祥不和的传言。

行动党高层领袖于1990年9月24日，促请李霖泰收回辞去该党联邦直辖区主席职位的辞职信，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表示，如果李霖泰坚持辞职，将会是行动党的一大损失（《南洋商报》，1990年9月25日）。林吉祥也在9月25日和李霖泰讨论他辞职的事，希望可以说服李霖泰打消辞职的意念，但是李霖泰依然坚持辞职（《星洲日报》，1990年9月25日）。行动党吉隆坡南区更在9月28日发动群众签名运动，该支会主席程锡杨表示，希望通过群众的挽留声中促请李霖泰不要辞职（丘光耀，2007：278）。同日，林吉祥从行动党总部发表文告，训令全体党员，不要对李霖泰的呈辞的问题发表任何评论，以使情况冷却下来，让党领袖层解决问题（丘光耀，2007：278）。

李霖泰在 1990 年 9 月 28 日向传媒声称，他不会辞掉行动党副秘书长的职位。李霖泰的这番言论看来可能会有转机。但是于 1990 年 9 月 29 日，李霖泰突然宣布退出政坛，这个决定让行动党领袖、党员和行动党支持者感到错愕，过后他便匆匆地飞往新加坡（《星洲日报》，1990 年 9 月 30 日）。三个小时后，李霖泰在新加坡致函给行动党全国主席曾敏兴，宣布辞去所有党职（丘光耀，2007：278）。

李霖泰在 1990 年 9 月 29 日向媒体发表了他退出政坛的文告：

“经过深入及认真的考虑，我决定辞去人民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主席职位，所引起的各项事情，及与我家人彻底讨论了此问题后，我现在决定立刻退出政坛。我将继续保留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的职位，直到本届国会届满为止。之后，我无意再参加竞选。在花费我生命中逾 20 年的岁月，献身服务行动党及人民后，欲作出这项退隐政坛的决定，是很痛苦的。我要感谢人民，特别是武吉免登区选民对我的支持及信心，我已竭尽所能的提供服务，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在过去那么多年的岁月里，对于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解决各族贫困与极需协助人民的各项难题，使我感到欣慰。虽然我决定退出政坛，不再参加大选，但是，我将会在武吉免登区继续维持一个服务中心，为人民提供各项服务。我欲重申，退出政坛是我最后的决定”（《通报》1990 年 9 月 30 日）。

第五种说法是当时盛传李霖泰引退的原因是因为接受执政党的一笔高达数百万的巨款，作为他退出政坛的代价，以间接打击行动党和 46 精神党（丘光耀，2007：280）。箭头指向李霖泰夫人叶桂虹（Marry Yap Kooi Foong）因涉及豪赌而欠债累累，李霖泰才作出政治牺牲来帮太太还债；然而这只是传言，没有实质的证据（丘光耀，2007：280）。但无可否认的是，李霖泰的夫人在他引退的这件事上确实有所影响。林吉祥在最后关头在行动党总部秘书长办公室和李霖泰讨论其辞呈问题时，叶桂虹确是谈判人之一，丘光耀²⁷当时在行动党总部听见秘书长办公室传出的争吵声浪，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丘光耀，2007：280）。另一个传言是指叶桂虹要挟李霖泰若不退休，她将会把两个孩子带离马来西亚，远赴澳洲，不再理睬李霖泰，因此推断李霖泰的辞呈与他太太有关（丘光耀，2007：280）。

在同年的 10 月 3 日，李霖泰夫人叶桂虹，首次对媒体发表声明，说过去的这么多年对李霖泰来说是一种牺牲，而退出政坛后，他将会有更多机会与孩子接近，她也指出李霖泰的辞呈是因为有一些行动党领袖背地里对他展开一项运动，但却没有清楚交代是什么运动（《南洋商报》，1990 年 10 月 4 日）。叶桂虹也表示，李霖泰是因为有人在暗中破坏他而

²⁷丘光耀（Hew KuanYau）祖籍广东省梅县，1970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安顺。1988 年毕业于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之后与友人联合创办漫画工作室。1994 年毕业于新山南方学院马来学系，同年获选为马来学系优异生；1997 年考获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也获颁 1996 年南粤优秀研究生一等奖；2005 年考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获颁中大莫庆锵奖学金。丘光耀在 1989 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受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社会与文化秘书。1997 年至 1999 年担任林吉祥政治秘书，2000 年至 2002 年担任郭金福的政治秘书，并兼任《火箭报》华文版主编，同期亦担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丘光耀，2007）。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宣布退出行动党。

辞职的（《中国报》，1990年10月4日）。她重申李霖泰不会跳槽到其他政党去，同时也表示，李霖泰对退出政坛的决定感到非常痛苦（《南洋商报》，1990年10月4日）。

在李霖泰引退后，于1990年10月30日晚上，行动党半山芭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一项议案，限定李霖泰在七天的时限内交出三千零吉的竞选基金和半山芭服务中心的重要资料（《星洲日报》，1990年11月9日）。李霖泰为此事感到非常失望，他澄清自己没有私吞党或任何人的竞选基金，他也希望可以保持自己一贯的作风，不对党作出任何的批评。他将会把这件事交由律师处理。他在文告中表示希望行动党的党员及领袖们可以让他独处的度过一生并确保他的家庭有个美好的未来（《星洲日报》，1990年11月10日）。由此可见，李霖泰对行动党的某些党员感到非常失望。

即使外界对李霖泰退出政坛后的动向非常好奇和作出了很多不同的推测，但是李霖泰依然保持低调，不对外界作出任何的解释。但是最后也发表了他自己的立场，指出他已经在宣布引退时，说了他想说的话，也很感谢那些支持他的朋友们，他觉得遗憾的是有些言论已经对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了伤害，他深信谣言会止于智者（《南洋商报》，1990年11月29日）。其实李霖泰也曾经在1990年9月25日时，在《星洲日报》和《新明日报》发表文告表示，他辞职后不会跳槽到其他政党，会坚持

自己的立场及原则。他做出这样的声明，目的是为了给行动党及人民一个交代，不要对他的辞职做出任何的猜测。²⁸

²⁸笔者曾为此原因与李霖泰联络，求证当年他退出行动党的原因。最后李霖泰透过他的私人助理，叶建安先生以电邮回复告知他当年退出行动党的主要原因是无法与党内的一些领袖和睦共处与合作。叶建安（李霖泰私人助理）电邮；日期：2017年11月20日；时间：5:42p.m.。

第四章 李霖泰的社会服务

第一节 李霖泰在任内的服务

李霖泰中选为议员后就积极为市民服务，有报导这样形容李霖泰：

“无论是在受拆屋令影响的地区，小贩云集的街道，或是大火洗劫后的灾场，工友罢工的地点，都可以发现他的踪影。他就是这么一个十足的全部时间的政治工作者。”（《南洋商报》，1985年7月6日）。此外，他经常驾着一辆半新旧的车子大街小巷地跑，车上放着一部英文打字机，只要市民有疑难找他，或代填表格，或代拟函件，他都会很乐意地帮忙他们（《南洋商报》，1985年7月6日）。他也为不谙马来文的市民与商贩们草拟信件。

李霖泰积极地为市民处理及解决民生问题，为市民争取他们应有的福利。他处理过的事件多不胜数，其中包括人民面对的房屋问题、房屋入伙纸问题、交通过路费、小贩的执照问题、公积金问题、贫穷问题和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等等。当市民面对问题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李霖泰，找他协助解决。在温任平的“第三只眼”的专栏中也提到，陈志勤在英文星报（The Star）和南洋商报的专栏上也曾提过，每当吉隆坡或首都附近发生天灾人祸时，国会议员李霖泰经常都是第一个抵达现场慰问灾黎的从政者（《南洋商报》，1985年7月6日）。*Lee Lam Thye di mana-mana*（1985）这本书也形容李霖泰为人谦虚，可以被各族人民接受，他关心人民的各方面的事务与问题。只要哪里有灾难，如：火灾和水灾等，

李霖泰一定会在灾难现场。他经常维护各族群的利益，是一位为各族人民服务的领袖（Vinpress Sdn. Bhd., 1985:5, 6）。

李霖泰除了在国会积极为人民争取更多的福利和平等的权益，他甚至走出办公室，亲自去巡视菜市场、了解沟渠、水道阻塞的问题、近距离去了解人民的疾苦和帮助人民解决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由于李霖泰所关注和所做出的服务和事件甚多，笔者总结七个部分，为李霖泰所做出的服务与贡献作为论述，以突出他在任内时所作出的贡献和作为一位服务型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李霖泰担任国会议员时，由于服务对象尤以吉隆坡半山芭区（Pudu）的小贩最多，故被誉为“吉隆坡小贩之父”（丘光耀，2007：273）。除此之外，茨场街的“李霖泰菜市场”以李霖泰之名来命名，主要原因是当时政府要拆除这个菜市场时，李霖泰极力争取而获得保留，之后选民便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菜市场，作为纪念他（《东方日报》，2010年2月22日）。图一为李霖泰菜市场。



图一：李霖泰菜市场（摄于 2018 年 1 月 8 日）

当吉隆坡的小贩面对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会寻求李霖泰的协助。小贩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资金短缺、被市政府吊销执照、被发传票、面对当局执法人员拆除档口及被迫迁移的事项等等。如：在吉隆坡一带的小贩于 1989 年间，被吉隆坡市政府以美化市容为由，吊销他们的执照、被开传单、拆除档口，甚至遭到无理的对待（《中国报》，1989 年 7 月 12 日，《中国报》，1989 年 10 月 13 日）。而在 1990 年时，半山芭的业主因将货品摆放在商店的走廊上而遭到吉隆坡市政府开出传单，其罚款数额从八十令吉至二百令吉，使到业主们大受损失，也影响到他们营业（《星洲日报》，1990 年 9 月 24 日）。为此，李霖泰发表文告，提议市政府教育小贩们照顾摆档地点的卫生和清洁，而非吊销小贩

的执照，开出传单，他也促请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勿对小贩无礼（《中国报》，1989年10月13日）。

此外，李霖泰也非常关心小贩的福利，为他们争取资金上的协助。他于1989年1月23日发表文告，希望政府能够公平地把五千万的小贩商贷款基金，借贷给有需要的各族小贩和商人，不要偏袒某一个族群（《星洲日报》，1989年1月24日）。他也建议政府提高小贩特别贷款的额数，由本来的五千增至一万令吉，而且还提议有关当局调整该贷款的摊还期，由原本的2年展延至最久5年（《中国报》，1989年11月13日）。此外，他也促请负责处理贩商贷款的贷款担保（马）有限公司能够简化申请手续及尽快处理小贩商的申请，以便可以让小贩商解决他们所面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南洋商报》，1989年1月27日）。

不仅如此，他于1990年5月19日巡视华都牙也（Batu Gajah）时，发现怡保红泥山一带的道路因为长期的水患，而导致破烂不堪和万里望菜市场的缺乏各项措施及环境卫生等问题，他发表文告说会将会尽力替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中国报》，1990年5月21日）。此外，他也答应当地的小贩会与万里望的国州议员商讨有关猪肉贩不能将猪肉吊挂起来售卖的问题，他也解决了华林市（Falim）菜市场内灯火的开关管制问题，他认为菜市场内的灯要依随街灯的开关时间来操作，这样才可以更方便地让小贩营业（《中国报》，1990年5月21日）。李霖泰不分种族的为人民服务，受到基层人民的好评，如一位住在文良港（Kawasan Parlimen

Setapak) 的一位马来商人表示当他遇到问题时, 比较容易找到李霖泰相比与自己居住的地方的议员, 而且李霖泰比起其他议员解决问题的效率非常快, 很快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名印裔穆斯林 (India Muslim) 商人则表示, 他与朋友时常获得李霖泰的帮助, 尤其在申请商业执照方面, 李霖泰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Vinpress Sdn. Bhd., 1985:34)。许多身为小贩的马来人, 居住在组屋和非法木屋区的马来人都会选择寻求李霖泰的帮助, 因为李霖泰时常接近基层人民, 当人民遇到问题时, 也比较容易找到他 (Vinpress Sdn. Bhd., 1985:34)。

此外, 李霖泰非常关注贫穷人民的利益及福利, 他积极地为没有能力购买房屋的人民和木屋区居民向政府争取廉价组屋和长屋, 以便有安身之所。我国在 1980 年代时, 依然还有许多人民没有能力购买房屋而居住在非法木屋区, 因此在吉隆坡一带出现了很多非法木屋区。李霖泰针对此事吁请, 政府加速兴建廉价屋, 以便可以完成“居者有其屋”的计划 (《新晚报》, 1989 年 7 月 7 日)。李霖泰吁请市政府在计划房屋发展计划时, 增建出租租屋单位给没有能力购买屋子的市民, 以便他们可以有栖身之所 (《南洋商报》, 1989 年 9 月 9 日)。按李霖泰的看法, 在联邦直辖区境内, 每年最少要兴建一万个单位, 并把部分的单位供出租, 一部分供出售, 这样才能使没有能力购买房屋的贫穷木屋居民有房子居住, 也能达到政府计划在 2000 年时, 完全消除非法木屋区的目标 (《南洋商报》, 1990 年 2 月 10 日)。李霖泰一直都非常关注居者有其屋的计划, 他于 1990 年 8 月 23 日时指出只有一部份人民已经购买到向市政府租

了超过 10 年的组屋，可是大部分向市政府提出申请的租户却没有下文，为此他促请市政府履行 1982 年时许下的承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星洲日报》，1990 年 8 月 24 日），达到每个市民都可以有能力拥有自己的房屋的目标。

由于吉隆坡一带的木屋居民经常在豪雨后面对水灾的问题，因此李霖泰建议市政局兴建廉价组屋或长屋来安置这些居民，同时拨款改善吉隆坡的排水系统（《南洋商报》，1987 年 11 月 30 日）。他的这项建议获得了首相署的同意，并拨出一千万令吉来建筑长屋，让经常受到豪雨成灾地区的木屋区居民搬迁到长屋去居住（《南洋商报》，1987 年 11 月 30 日）。李霖泰也促请吉隆坡市政府重新检讨房屋政策，在征用木屋区时，为持有红身份证的木屋居民安排居所，因为在政策的限制下，他们是无法取得组屋或长屋单位的，因此李霖泰促请市政府重新修改房屋政策，以便可以让这些持有红身份证者也能够申请政府组屋和长屋等（《中国报》，1989 年 11 月 26 日）。

为了可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计划，李霖泰促请时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的李金狮²⁹（Lee Kim Sai）采取行动对付那些擅自提高屋价的房屋发

²⁹李金狮祖籍福建安溪县湖头镇，于 1937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淡江。毕业于吉隆坡中华中学后，入读政府师训学院，毕业后在甲洞华小服务长达 10 年。于 1965 年，加入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青年团（简称马青团）并被委任重要职位。过后，担任马华公会士拉央区会主席、马华公会雪兰莪州联委会秘书及马来西亚政府首相署国民团结局社区联络官。1974 年大选时，获选为万挠州议员。于 1978 年，由州级领袖晋升中央领导层，当选马青团总秘书，1979 年，当任马青团团长。李金狮在 1982 年的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此后，他也曾担任劳工部长（1986 年），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1989 年）和卫生部长（1990 年）至退休。李金狮在 1985 年 11 月的党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副总会长兼

展商，以免增加购屋者的负担（《中国报》，1990 年 5 月 1 日）。他也促请乡村发展部关注房屋计划工程中停顿的问题，也建议必须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来挽救这些计划，这样才能维护购屋者的利益（《星洲日报》，1990 年 4 月 12 日）。

不仅如此，李霖泰也非常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福利，他促请政府设立一项政策，保障残障人士的基本权利，他也指出这些残疾人士于 1989 年为止是马来西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他们也是贫穷的一群，他提议政府给予他们各项优先权，包括工艺训练班、工作机会、房屋及交通方面的福利（《中国报》，1989 年 11 月 6 日）。他也建议设立一个由政府代表、私人界、志愿团体及残障人士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关注残疾人士的权益和福利，他也建议增加福利的拨款，强制性登记全国残障人士和举办更多的座谈会，使公众人士认识有关法令及残障人士的权益（《中国报》，1989 年 11 月 6 日）。即使李霖泰隐退政坛后，他依然关心残障人士的权益，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关注残障人士的待遇与福利，也建议政府为残障人士提供良好的公共设备（《中国报》，2000 年 11 月 13 日）。

李霖泰除了关注小贩、贫穷人民和弱势群体之外，他也非常关注教育，他促请时任教育部长的安华依不拉欣（Anwar Ibrahim）确保在预算

总秘书，1986 年，出任署理总会长。李金狮于 1993 年宣布引退政坛，进军商场，并出任多家挂牌企业的董事要职（何启良，2014：630-633）。

案中公平合理的拨款给华文小学。他指出国内的许多华小都面对教室不足和校舍陈旧的问题，急需经费来重建与扩建校舍（《中国报》，1989年10月9日）。他促请政府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并废除1961年的教育法令第21条文，那就是教育部有权把华小改为国民小学的法令，这样才能确保华小不会变质（《新晚报》，1989年11月5日）。他也呼吁政府拨款资助发展及承认独中的统考文凭，也批准独中生以统考文凭申请进入国内大学及师训学院深造，他指出独立中学已经为国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国家应该重视这些人才，才不会导致人才外流（《星洲日报》，1989年11月6日）。由于政府不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很多成绩优越的独中生毕业后只能选择出国留学，并留在该国工作，造成人才外流，为此他呼吁政府应该承认独中在这方面的贡献和独中文凭，以便让独中的学生可以在国内大学就读或进入公共服务界为人民服务（《南洋商报》，1989年7月4日）。他也表示既然政府开放玛拉工艺学院（现已升格为大学,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给印尼、汶莱、泰国及澳洲的学生，他也希望政府开放玛拉工艺学院的门户给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学生，让他们也有机会进入该学院深造（《南洋商报》，1989年7月4日）。

李霖泰认为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平等地位和享有共同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和权益以及人民的团结，李霖泰表示行动党完全支持“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的主张，反对种族性的固打制，并要求在1990年时废除种族固打制，他也指出政府应该开放所有领域，以公平、竞争和才华作为标准，种族固打制只会破坏国民的团结

（《中国报》，1989年4月11日），他希望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作出改变，以达至全民团结。李霖泰在1989年4月15日继续表明，国家在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除了注重经济成长外，也须不分种族，消灭贫穷及缩短贫富之间的鸿沟（《通报》，1989年4月16日）。他也指出要让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政府必须先废除新经济政策中最具争议性的划分民族的固打制，而且还必须推行一些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府必须尊重人权、正义、民主和法治，废除一切侵犯基本人权和否定公民基本自由权的法律，拒绝一切导致种族极端、种族歧视、种族主义滋长的行政与言论和不分种族的赋予宪法上保障和维护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文化等的基本权益（《南洋商报》，1989年7月4日）。

他也针对政府所实行的计划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不认同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说马来西亚华裔公民很幸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言论（《中国报》，1989年7月5日）。他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裔公民是争取国家独立的一份子，因此政府应该保证华裔在各项政策上享有与其他族群一样的保障和公平的对待（《中国报》，1989年7月5日）。他也希望政府采取开明的态度对待各族的文化，也可以将舞狮、舞龙、中华武术及其他的中华文化可以列入国家的文化（《星洲日报》，1989年8月1日）。

李霖泰也提出要让国民团结的先决条件，是先让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其他领域都能获得公平合理的对待与机会，他指出行

动党主张以一项国家发展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国家发展政策包括几个概要，其中包括承认大多数的马来人、卡达山人、依班人、毛律人和比达尤人等都是入息低微的贫民，并保证他们将会比过去二十年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中获得更公平和合理的对待，缩短马来西亚贫富之间的财富与收入鸿沟，强调及突出马来西亚人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及文化领域中的共同点，停止将人民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大学与大专学院录取新生时以实绩及社会经济需求作为标准，铲除金钱政治、贪污以及促进与维持一个民主的政体、充分地尊重人们的生命、自由与尊严权力（《星洲日报》，1989年7月9日）。李霖泰积极地争取各族人民可以享受平等的待遇与地位。

李霖泰在为民服务方面获得不少好评，1985年6月9日的《诗华日报》指出李霖泰虽贵为反对党领袖，但是他处事认真，为人谨慎，而且是非分明，绝没有意气用事，不会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他把全副精神和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服务选民。这些年来，他任劳任怨，默默地为选民们解决民生问题，且经常深入社会，去体会和了解民疾。报道更指出，就算是马哈迪医生或者林吉祥到吉隆坡与李霖泰竞选，也很可能被李霖泰击垮（《诗华日报》，1985年6月9日）。

虽然如此，温任平则对李霖泰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代议士的要求只是仅限于“代填表格，代拟函件”，“火灾土崩发生时迅速赶到现场”，那肯定是有缺憾的。一个贤明的政治家应该有他的一套政治

理想抱负，而且还要身体力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抱负去奋斗。他认为李霖泰应该厘定一个政治方针和计划，而“代填表格，代拟函件”的工作是一名受过中等教育的书记的工作。而以政治人物在这方面工作的勤快程度来衡量他的政治素质与功业，这标准实有悬鹄过低之嫌（《南洋商报》，1985年7月6日）。笔者则认为，愿意完全委身去接近和服务基层人民的国会议员是不可多得的。李霖泰可说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将民生问题带到国会去，自己也亲自去接触低下层人民，以便可以更了解他们和帮助他们。

第二节李霖泰退出政坛后的服务

李霖泰退出政坛后，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他延续了他服务人民与社会的理念，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担任了多个重要的职位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他与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样，多数的政治人物退隐后，通常会往商界或其他领域发展，而不是受邀担任政府机构的要职³⁰，对于反对党的领袖而言，在退休后或退隐政坛后，更不可能受到政府的邀

³⁰曾经是马华公会领袖的李金狮，在退休后便往商界发展，没有受到政府邀请担任任何的职位，李金狮于1993年宣布引退政坛，进军商场，并出任多家挂牌企业的董事要职（何启良，2014：630-633）。陈志勤曾是反对党的领袖，于1976年，宣布退出政坛，退休后勤于写作，曾在《星报》，《南洋商报》与《淡米尔文报》写稿，之后在“无畏无私”的专栏撰写时事评论。陈志勤一生虽为反对党领袖，号称“反对党先生”，但他对国家的贡献仍然获得社会和政府的肯定。于1980年被最高元首赐封为丹斯里（Tan Sri），1985年又获得雪兰莪州苏丹赐封拿督（Datuk），这对反对党领袖而言是非常罕有的。如时任联邦大法官的苏菲安（Suffian）所言：“陈志勤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因为他希望批评后政府能够改善它的政策。”（何启良，2014：246-249）。李三春是马华公会的第四任总会长，从1974年开始从陈修信手中接管马华公会，1975年正式担任总会长至1983年，为时27年。李三春于1983年3月25日宣布引退政坛（何启良，2014：662），之后也没有受到政府邀请担任任何的职位。

请担任政府机构的要职。李霖泰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他曾经是反对党的领袖，但是退隐后却受到政府的看重，甚至受邀担任多个要职（见表四）。

表四：李霖泰退隐政坛后，在政府机构担任的职位

年份	职位
1992-2005	全国反毒品滥用协会副主席
2000-2001	全国经济商讨理事会理事
2000-2002	大马人权委员会成员
2000-2005	吉隆坡中央医院探访委员会主席
2004-2005	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提升特别委员会委员
2006	吉隆坡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东姑阿都拉曼基金会信托人
2007 年依然担任的职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 2. 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主席 3. 大马防范罪案基金会副主席 4. 大马陆军后备荣誉上校 5. 国民团结咨询委员会委员 6. 隶属卫生部的捐献器官教育小组主席
2000-2001	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
2000-2001	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
2004-2005	皇家警察委员会成员

1996-2/2008	吉隆坡市议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2002-2014	实达基金会主席
2005-6/2008	国民服务委员会主席
2010-2015	公积金董事会会员
直到 2017 年 还担任的职位	1. 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主席 2. 马来西亚研究所道路安全研究主席 3. 大马防范罪案基金会副主席 4. 1 个马来西亚基金会信托董事 5. 隶属卫生部的捐献器官教育小组主席 6. 马来西亚开放大学主席与董事 7. 隶属卫生部的推广精神健康顾问委员会会员 8. 隶属首相署公众投诉机构咨询委员会会员 9. 马来西亚肾脏基金会信托董事

资料来源：整理自《南洋商报》，2007 年 3 月 26 日、叶健安（李霖泰助理）

李霖泰于 1991 年 8 月担任由全国防止滥用毒品协会成立的民族团结及青年局副局长（《中国报》，1991 年 9 月 28 日），从那时开始他积极地做反毒品活动和关注吸毒者戒毒后重返社会的情况。李霖泰在 1991 年 10 月 28 日，指出直到 1990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有 15 万名吸毒者，其中年龄介于 20 岁至 29 岁的青年人数最多，占了百分之 64.2，其次是年龄介于 30 岁至 39 岁的吸毒者，人数占了百分之 29.9，而年龄介于 10 岁

至 19 岁的吸毒者占了百分之 12.8，他号召直辖区的各阶层人士，包括家长、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积极参与反毒运动，以唤醒大众对滥用毒品的警觉（《南洋商报》，1991 年 10 月 29 日）。同时，他希望政府可以播出更多的款项兴建戒毒所，让吸毒者在接受戒毒后，也可以接受辅导教育，学习各种技术，让他们有信心重新踏入社会（《南洋商报》，1991 年 10 月 29 日）。

此外，他呼吁社会与家庭谅解和接纳已经戒毒的吸毒者，帮助他们，不要让他们自暴自弃而再次吸毒，同时也号召志愿团体和自愿人士参与协助戒毒者（《南洋商报》，1991 年 8 月 11 日）。他也促请每一位马来西亚公民，尤其是华社和一些团体或组织踊跃参与全国防止滥用毒品协会的活动，以唤醒吸毒者，他指出滥用毒品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治安问题，而且吸毒者年龄介于 10 岁至 29 岁的青少年居多，他希望各族人民可以关注青少年，确保他们不会染上毒瘾（《中国报》，1991 年 10 月 21 日）。

为此，他建议政府鼓励国内的所有学府，都加入成为全国防止滥用毒品协会的附属会员，也可以在学校里成立类似童军、红新月会等的制服团体，在校内推广反毒运动和向学生灌输毒品的害处等知识（《南洋商报》，1991 年 8 月 7 日）。他也说，根据调查显示 14 岁至 29 岁的年龄阶层是最容易受到毒品所侵害的，他希望号召更多的学生自动自发地

参加扑灭毒品活动，全国防止滥用毒品协会的目标是“反毒工作由学生做起”（《南洋商报》，1991年8月7日）。

李霖泰在1991年10月27日时，促请联合国扩大及加强对抗全球性滥用毒品问题。他说我国需要有更强大的国际性组织，以遏阻毒品的供应及提供更多的戒毒中心（《南洋商报》，1991年10月28日）。他针对联合国所出版的一份全球性的合作新概念作出置评，他说联合国应研究设立国际法庭以审判毒贩，也应该拨出更多的款项，以进行辅导教育的计划和研究消除毒品的计划，他也建议联合国设立一个国际毒品执法单位，以协助监督不同区域的贩运毒品问题（《南洋商报》，1991年10月28日），以免毒品容易渗入不同的国家。

尽管李霖泰于1991年建议在学校推广反毒运动、向学生传达毒品的害处和反毒意识，但是学生滥用毒品的事件依然存在。李霖泰于2011年指出儿童滥用毒品的事件越来越严重，甚至连12岁的儿童都涉及滥用毒品和吸强力胶。虽然警方非常关注此活动，但是当时在1952年的毒品危险法令，没有任何条例可以对吸强力胶者提出控诉，因此警方被迫释放这些被捕的吸强力胶者（Lee Lam Thye, 2015:198）。李霖泰指出吸强力胶会导致头脑损伤，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他建议这些涉及吸强力胶的儿童必须接受辅导。此外，他建议政府设立特有条例来控制商家不要随意售卖强力胶，他也呼吁父母多关注自己的孩子，以免他们涉及滥

用毒品和吸强力胶。李霖泰也促请政府尽快设立条例，防止这项事件持续严重（Lee Lam Thye,2015:198）。

在国民服务计划（Progam Latihan Kidmat Negara, PLKN）方面，李霖泰受到时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的纳吉（Mohammad Najib bin Abdul Razak）邀请代替第一任主席阿末法兹（Fauzi），出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职位。他于2005年6月23日，正式接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一职（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2003：8）。

其实李霖泰也是国民服务计划发起人之一，在2003年参与“马来西亚青年的未来”研讨会时，向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建议推行一项可以让各族青年，尤其是中五毕业生参与的活动。在两个星期后的内阁会议中，国民服务计划正式被通过（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33）。国民服务的概念是为了塑造有纪律、有活力、有信心的年青一代、效忠国家及时刻准备接受任何的挑战与任务，以及培养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精神（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35）。这项计划的目标是为了达致传播及激发青年的爱国精神，加强各族青年的和谐与团结，提升青少年的性格塑造及领导能力，并激发青少年服务社会的志愿精神（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36）。

李霖泰接受出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一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可以继续为国家服务，这是他在过去担任国会议员和退隐政坛后都依然坚持

的信念，其二是他认为这项计划可以灌输青少年基本的国家建设和社区服务等的思维，可以塑造出更多的有为青年（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 47）。虽然在进行这项计划时，曾经发生营地分配问题、工作人员不足、医疗设施不完善、营员死亡事件等等，但是李霖泰尽其所能尽量去改善这一切，甚至为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处理国民服务的事情，他辞去了国家反毒品滥用协会（PEMADAM）的副主席一职（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 38）。在李霖泰的带领下，国民服务训练营里的安全有所改善，并且在 2004 年至 2008 年期间，李霖泰共安排了近四千名自愿参加国民服务计划者入营（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 28）。李霖泰对国民服务的最大目标是零死亡和零意外（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 25, 28）。尽管李霖泰有意对国民服务计划作出调整和改革，但基于他没有执行的权力，这使到他受到很多的局限。对于每一项决策，他都必须与国民服务训练局总监阿都哈迪开会，才可以执行。例如李霖泰在营员的健康与安全方面，他多次与总监讨论并提议所有国民服务的营员都必须强制接受医药身体检查，可是卫生部却无法执行（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 83）。

2007 年 1 月 29 日的南洋商报社论提及，国民服务局理事会主席李霖泰建议撤换国民服务训练局领导层及毫无效率的部门主管，而没有建议撤销整个国民服务计划，是很有保留的做法。李霖泰身为理事会主席，面对一班敷衍了事的手下，却无法对他们作出任何的管制。同时，他也接到很多投诉国民服务计划的电话，但却无法作出任何的改变和完全解

决所面对的问题。对此，他感到十分的无奈。因为国民服务理事会只是扮演‘督导’角色，能‘监’而不能‘管’，最多只能向国防部长请示报告及提出建议。真正有权利的是国民服务局总监，李霖泰即使有心整顿国民服务，却没有实权。而国民服务计划或营地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体制上的问题。李霖泰当了三年的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于2008年6月23日，正式卸下这个职位（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2003: 6）。

表五： 李霖泰出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时所作出的一些改革。

序号	改革的事项
1	建立国民服务监督委员会，由理事会里的理事担任各州监督委员会的主席，而各州主席可以委任5至10名监督委员会成员。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人民代议士、地方领袖、非政府组织成员等。
2	由于在2007年1月1日，全国多个营地在报到日时发生混乱的局面，因此，李霖泰将国民服务报到日从原本的一天改为两天。
3	在2007年3月14日的理事会会议中，李霖泰建议应该豁免女性参与国民服务训练，理事会以男女平等，不可有性别歧视为由，最后把男女比例改为60: 40。
4	已经结婚并已经生产的女性可以豁免参与国民服务
5	李霖泰于2007年3月24日提议将营员的一百令吉的津贴增加到一百五十令吉。政府于2008年初宣布批准这项提议。

6	李霖泰向国民服务理事会建议修正 2003 年国民服务法令第 24 项（1）条文，将原有的条文，雇主必须允许职员入营，并支付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修正为雇主必须支付被召入营的职员，至少两个月的薪金及续聘相关的职员（待理事会的决定）
7	国民服务训练局和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NIOSH）签署 18 个月的合约，让审查人员到全国 87 个营地审查体能训练的设施，确保设施安全。

资料来源:取自《李霖泰与国民服务言行录》，2003。

李霖泰除了在反毒和国民服务计划上有很多贡献，他在职业安全及卫生方面也贡献了不少。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于 1992 年 12 月 1 日成立，创造了自我管制安全的文化，标志着马来西亚的职业安全与健康领域的一个新里程碑。早在 1985 年，李霖泰在全国安全与健康咨询理事会的一个会议中，首次提出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之后在每一次财政预算案的辩论中，他都提出成立这个组织的建议（《新明日报》，1992 年 12 月 25 日）。所以，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成立之时，李霖泰就被指定为此机构的主席。

1986 年 5 月 12 日，李霖泰根据劳工部决定检讨社会保险法令时，建议社会保险机构挪出部分基金，作为工业安全及工人健康的用途。他提议政府寻求社会保险机构协助，设立一个安全及卫生学院，以训练私人

界及公共部门的工人（《南洋商报》，1986 年 5 月 13 日）。于 1987 年 12 月 31 日，李霖泰透露社会保险机构的资产日益增加，可是付出予会员福利的款项却很少。因此建议社会保险机构用其基金成立一个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专门研究工人面对的各项工业意外，职业安全与健康以便能有效地阻止不幸的意外发生在工人身上（《南洋商报》，1988 年 1 月 1 日）。

成立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的主要目标是：

1. 拓展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课程及训练计划
2. 协助工商业和其他领域解决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
3. 为医药人员、护士、执法人员、工业卫生人员和其他相关领域人士提供最新的资讯
4. 为危险性较大的行业推行特别训练
5. 为所有工业提供一切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技术指导与服务

（《南洋商报》，1993 年 8 月 1 日）。

政府非常重视职业安全与健康学院的成立，在第六项大马计划中，拨出一千六百万令吉来兴建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同时也准备了五千万令吉供该学院作为行政开销的辅助金。李霖泰呼吁所有的工业，如：制造业、农业、树桐业、建筑业、化学业及其他危险的工业业者都

必须派出管工或经理到职业安全与健康学院接受安全措施知识，以减低意外发生（《中国报》，1994 年 12 月 20 日）。

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减低在工作场所的意外发生率，也提高每一个人对危机的处理，就如在 1993 年 12 月发生的高峰塔倒塌事件，造成大约 70 人丧命，针对这事件，有关高楼建筑，除了需要设立安全监督小组，监督建造阶段和保养阶段，住户也要学习危机处理，以应付一切危险的情况（《南洋商报》，1994 年 2 月 27 日）。此外，于 1994 年在巴生和巴西古当（Pasir Gudang）发生建筑工地发生意外，导致四人死亡和五人受伤事件，与于 1995 年 6 月云顶土崩，导致 20 人死亡事件都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事故都是因为工地安全受到忽视而引发的，所以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非常重要，可以提高一个工作环境的安全与卫生，减低工人伤亡的机率（《南洋商报》，1995 年 7 月 31 日）。李霖泰除了在工作场所推行职业安全与卫生的提升，他也建议在学校推行此项计划，以减少师生伤亡事故（《中国报》，2005 年 1 月 12 日）。

在 1994 年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法令下，只要工作场所拥有超过 40 名员工，雇主和雇员就得成立职业安全及卫生小组，以讨论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卫生问题（《中国报》，2006 年 12 月 21 日）。职业安全是基本人权，当雇员在一个场所工作时，就应该有职业安全的保障。安全不但对工作人员重要，对公众人士也一样重要。李霖泰从担任国会议员开始就不断地呼吁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一直强调职业安全与卫生的重要性。

身为主席的他也一直积极的通过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来教育国内各领域的雇主与员工，加强对职业安全与卫生的意识与训练。根据社会保险数据显示，于 1993 年共有 13 万宗工业意外，可是于 2005 年，工业意外减至五万宗，这证明了职业安全及卫生机构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率和伤亡人数（《中国报》，2006 年 12 月 21 日）。

李霖泰自 1992 年便担任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主席至今，已有 20 多年了，他表示引退政坛后，担任的众多职位中，自己最喜欢和满意的就是这个职位，因为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也可以为广大民众服务，减低他们面对意外的机率，也可以帮助人民提升危险意识。³¹

由于李霖泰的服务型形象深入人心，在 1990 年宣布退出政坛和行动党后，除了受邀出任一些政府机构的要职，从 1991 年起，也受到非政府组织的邀请，担任了几个重要的职位，例如：他也在郭氏基金会³²担任顾问，该基金会是糖王郭鹤年属下的一个基金会，每年都会拨出大笔款项充当奖学金和贷学金（《南洋商报》，1991 年 1 月 11 日）。郭氏基金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那就是奖学金和社会公益的部分，李霖泰负责的是社会公益的工作（《南洋商报》，1991 年 2 月 23 日）。李霖泰曾经表示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工作的性质也很适合他（《通报》，1991 年 1 月 29 日）。

³¹叶健安（李霖泰私人助理）电邮：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时间：5:42p.m.。

³²郭鹤年家族每年拨出数百万元充作慈善教育用途（《通报》，1991 年 1 月 10 日）。

此外，他也在 2002 年至 2014 年间担任了实达基金会（SP Setia Foundation）的主席，他强调实达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协助政府塑造一个爱心社会，该基金会于 2000 年发动领养学生计划，受惠的学生将从一年级被领养至完成六年小学教育为止（《中国报》，2001 年 6 月 16 日）。李霖泰也担任了其他非政府机构的要职（见表六）。

表六： 李霖泰曾担任的非政府机构的工作职务：

序号	工作职务
1.	郭氏基金福利组顾问
2.	东姑阿都拉曼基金信托委员
3.	S.P. SETIA 基金信托委员
4.	吉隆坡中央医院慰问局主任
5.	绿盛世基金会 (Eco World Foundation) 主席

资料来源整理自：叶观仕，1995：101；叶建安（李霖泰助理）提供的资料

李霖泰退隐政坛后，无论是在政府机构或私人组织，他所抱持的原则依然是为了服务国民和让人民受益。即使在他任职国会议员的最后一天，依然关心茨场街后巷，南华布庄后面两排的十八个摊位的小贩被逼搬迁的问题。经过李霖泰与时任市政局小贩事务组主任的苏莱曼沙末商讨与争取之下，答应延长有关小贩在档口营业的限期大约一至两个月的

时间，再安排这些小贩到附近的地点，让他们继续营业（《星洲日报》，1990年10月7日）。

李霖泰从小的愿望就是为社会服务，自他23岁那年中选为州议员起，便开始为选民、国家和社会服务（《中国报》，2006年2月15日）。李霖泰退出政坛后，他还是继续献身社会，服务群众。他用自己在武吉免登的国会议员和雪兰莪州议员的退修津贴在吉隆坡敦拉萨（Tun Razak）三百三十七号，设立自己私人服务中心，处理之前还未解决的案件和投诉（《中国报》，1991年1月7日）。他表示自己虽然已经退出政坛，但表示对政治还是深感兴趣，而且还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局势发展（《中国报》，1991年1月7日）。卸下政治抱负的他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陪伴妻儿，和去做自己喜欢的活动，如钓鱼（《中国报》，1991年1月7日）。³³

李霖泰还成立了一所公司，专门提供意见与资讯服务，主要处理社会公益、协助独中、协助残障协会及退伍军人向政府申请基金和为市民服务，这都是他担任了二十多年国会议员所累积的经验，故非常熟悉其申请的部门和管道（《中国报》，1991年2月27日）。李霖泰退隐政坛后依然热衷于社会活动，他特别注重慈善和人民福利问题（《中国报》，1991年2月27日）。因此，他在20多个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关

³³李霖泰也参与于1991年，由爱国诗人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为首的委员会所主办的“白鸽之夜”朗诵诗歌大会，那是他第一次公开在大会上朗诵诗歌，他朗诵了《白鸽之泣》和他第一次所写的诗，《胡申与布什的对话》（《南洋商报》，1991年1月12日）。

担任要职，主要是服务社会与人民。李霖泰担任的这些要职中，并非每项职务都有薪资，而且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一职，每个月只能领取津贴，他担任的大部分要职都是属于自愿性质的，故为了增加入息，他也担任了几家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中国报》，2006年2月15日）。此外，由于李霖泰对政治和时事充满兴趣，从1991年3月3日起，他除了为南洋商报撰写专栏，主要针对时事、社会、经济及民生等问题抒发己见（《南洋商报》，1991年3月1日），他也为《马来西亚前锋报》、及《新海峡时报》撰写专栏（《通报》，1991年5月13日）。

退隐政坛的李霖泰与担任他国会议员兼行动党领袖时所作出的服务与服务对象有所不同。当他还是国会议员时，他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选民、小贩、灾民等，处理的事项多数是民生问题和在国会里监督政府的政策以及为人民争取权益。但是，退出行动党和政坛后，他的服务对象转向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处理全国人民福利的事项。相比之下，退隐政坛后，李霖泰所处理的事物与服务不但延续了之前的精神，而且其服务对象和领域更为广阔了。在没有受到政党的局限下，他可以更容易地去执行任务和服务。从李霖泰所作出的贡献与服务，笔者认为他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比起政治工作者的身份更为出色。

第五章 结论

纵观李霖泰的一生，可以概括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在参与政治的时期，而另一个阶段则是他退隐政坛后的阶段。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和文献，经过分析和归纳，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李霖泰的社会理念和政治理念从参政至退隐后，都是一致的。李霖泰政治理念是无论任何时候都会为人民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与为人民服务。而他的社会理想理念与行动党的理念如出一辙，主张各族人民可以共享公平的待遇，无论是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教育、经济、医药保健都是一样平等的。这就是李霖泰会选择参与行动党的主要原因，因为行动党在很大的程度上承续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哲学，主张种族平等、社会和经济公平，更重要的是行动党继续推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林水椽等，1998：81）。

从他加入行动党至退隐政坛，他服务人民与国家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想服务人民与国家的理念。李霖泰表示自己从小的愿望就是服务社会，向来注重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中国报》，2016年2月15日），在担任国会议员和行动党的领袖时，他将毕生的精神与时间放在人民的身上，只要有求于他的，他都会尽力去帮助他们，³⁴甚至是晚上，他也会去帮助他们。李霖泰是一位坚守自己的原则

³⁴ 《大众报》的记者江涛，形容李霖泰是全能的国会议员，除了要处理吉隆坡区的选民问题，也曾经帮助雪州和霹雳州来求助于他的人民。他说，李霖泰在十分钟内可以应付三位居民的孩子申请奖学金、一名居民的罚款、还要接受居民邀请他出席社团宴会的邀请，而且还要接听很多通电话。他还指出李霖泰在接获霹雳州的居民投诉受到屋业发展

和理念的领袖。1960年代至1990年代，马来西亚国家的局势可说是较稳定了，当国家大事稳定后，人民的问题却是不可忽视的。李霖泰在担任国会议员及行动党的领袖时，他愿意走出办公室，为基层人民作出贴身的服务。这与笔者童年时所闻的李霖泰事迹是相互符合的。退隐政坛后，他也接受多个政府与私人机构的职位，继续为人民和国家付出。

李霖泰的社会理念，在从参政时期至退隐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其所能，让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李霖泰心目中的马来西亚是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文化和语言的，他认为马来西亚人民应该享有一样平等的地位，可以融洽生活在一起，团结一致，使国家更兴盛。³⁵他时常发表文告，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及批判政府实行的一些导致人民之间不和睦的不公平的政策，如：我国实行的固打制、新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等等。³⁶李霖泰曾经发表，指出国民团结的先决条件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其他领域都能获得公平合理的对待与机会，他也指出行动党主张以一项国家发展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³⁷以便可

商欺骗时，他便马上写信并打电话向有关官员询问。李霖泰的办事效率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李霖泰的办公室内挂满了人民答谢他的锦旗（《大众报》，1987年7月31日）。

³⁵李霖泰促请政府尊重民意，积极实行能促进种族和谐的中庸政策，同时摒除任何偏激及极端的宗教、种族、文化及教育政策（《新晚报》，1987年8月9日）。

³⁶李霖泰于1987年公开促请时任首相的马哈迪禁止一切极端主义，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以确保马来西亚拥有光明的前途。同时他也促请政府积极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经济不景、失业和裁员问题，检讨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同时在1990年后，不再延长新经济政策。此外，他也强调，政府应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学术资格为录取准绳，让各族学生在公平的竞争下，同享高等教育的机会（《新晚报》，1987年7月5日）。

³⁷国家发展政策包括几个概要，其中包括：

1. 承认大多数的马来人、卡达山人、依班人、毛律人和比达尤人等都入息低微的贫民。他们都须获得保证，他们将会比过二十年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中获得更公平合理的对待。
2. 缩短马来西亚贫富之间的财富与收入鸿沟
3. 强调及突出马来西亚人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及文化领域中的共同点，停止将人民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

以让人民受到公平的对待，不要分化人民，他也希望政府可以推行这项政策，以团结人民为目标。

即使李霖泰退出了政坛，他依然抱持着这个理念，提倡国民应该不分种族、宗教，团结合一。他于 1994 年时，公开呼吁政府应该着重塑造一个全民团结的马来西亚，各族和谐共处（《新明日报》，1994 年 3 月 3 日）。李霖泰于 2006 年，公开发表，指出政府必须以公平及合理的态度对待各种族，才能真正达至全民团结（《中国报》，2006 年 12 月 8 日）。李霖泰于 2007 年至 2008 年，担任国民服务咨询委员会委员时，表示国民团咨询委员会是一个开明的组织，可以讨论任何涉及国民团结的问题，不分种族并鼓励各族积极与巩固各族间的联系（《中国报》，2007 年 2 月 27 日）。他希望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可以互相融合，团结一心。

李霖泰在 1988 年时，反驳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其国庆献词中所强调的团结概念。李霖泰指出团结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或学术性的概念，团结是需要共同和事迹的基础，人民团结的目的是要富国强民和实现一个公平合理和民主的国家，而不是滥用团结的口号来谋求个人或党派的私利。他强调行动党不同意被指为不负责任和具破坏性的政党，行动党批评政府是希望政府能够纠正其偏差和缺点，以确保人民的利益不受损

-
4. 大学与大专学院录取新生时以实绩及社会经济需求作为标准。
 5. 铲除金钱政治、贪污
 6. 促进与维持一个民主的政体、充分地尊重人们的生命、自由与尊权利（《星洲日报》，1989 年 7 月 9 日）。

害，况且他们的斗争是合法合理的，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中国报》，1988年9月1日）。

李霖泰曾经说过他的愿望就是可以为社会及国家做出服务与贡献。故在他从政时和退隐政坛后，他依然延续着自己的理念，尽其所能服务社会、人民及国家。笔者认为李霖泰退隐政坛后，反而令他在没有政党的限制下，可以让他大展拳脚，可以继续他想做的事。

李霖泰虽身为一位服务型的领袖，但他是否同时也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呢？在他完美的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主义下，是否真的可以打造一个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呢？也许是他温和的性格，使到他没有完全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去让行动党的党员信服于他。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如果没有使用到本身被赋予的权力，那么就无法展现出一位领袖的魅力。李霖泰的温和性格和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服务，可能是平民百姓追求的人民英雄。但是对于一个反对党而言，党员们要的可能是一个懂得发挥其独有的势力，并且是一个较强悍、有魅力、有说服力，能让他们信服的领袖。政治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圈子，许多人加入政治，除了为国民争取利益，也不乏为了实行自身政治理念的人。为了要实现这些理念，必须要脱颖而出，成为党的领袖才能吸引到众人的支持。然而李霖泰在行动党身居高位多年，却没有真正利用所得到的权力和势力来令众多的领袖和党员支持他。反而在党选时，没有得到多数党员的支持。而且他退出行动党的主要原因，是无法与行动党的一些领袖和睦

相处与合作，而这个原因是身为一个政治领袖的一个缺憾。反之，身为社会工作者身份的他，比起当政治工作者来得更出色，也更得心应手。

李霖泰多年来为社会、人民和国家服务与贡献受到大众的肯定。从 2000 年至 2017 年间，李霖泰总共获得了六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中亚洲大都会大学（Asi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MU）颁发给他的荣誉博士学位，是为了表彰他通过社会工作为社区作出的贡献。其他大学，如：马来西亚理科大学、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国能大学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则是表彰他在公共领域的服务（见附表二）。此外，政府和私人机构都认同李霖泰的社会服务，霹雳州苏丹于 1995 年赐封他拿督勋衔，而最高元首于 2002 年赐封他丹斯里的勋衔，于 2003 年获得雪兰莪苏丹赐封拿督勋衔。李霖泰是第二位获得赐封丹斯里勋衔的前反对党领袖，第一位则是陈志勤。此外，李霖泰也获得多个私人机构颁发表彰他的奖项（见附表三）。这些表彰和荣耀，足以证明他对社会与人民的付出与贡献，他的服务是值得被肯定的。

附表

附表一：李霖泰事迹简表

年份	事迹
1946 年 12 月 30 日	出生在霹雳州怡保万里望
1958 年	小六毕业
1966 年	中学毕业
1966 年	在母校圣米高英文学院当了几个月的临教，之后便到联合机器商店当书记。
1967 年初	在怡保成立行动党支会
1968 年	从怡保南下吉隆坡，担任全国商业雇员联会的执行秘书
1969 年	第一次参选，中选为武吉那那区 (Bukit Nanas) 的州议员
1971 年-1974 年	李霖泰在第三届中委会（1971-1974）从林吉祥手中接任全国组织秘书一职
1974 年	全国大选，李霖泰中选为吉隆坡市（1986 年时改名为武吉免登，Bukit Bintang）国会议员
1975 年	李霖泰和太太叶桂虹，洋名玛莉（Marry Yap Kooi Foong）结婚
1977 年-1979 年	在第五届中委会，李霖泰从全国秘书（1977-1979）转任政治教育局主任
1978 年	继续蝉联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
1979 年-1982 年	李霖泰自第六届中委会（1979-1982）开始出任副秘书长
1982 年	继续蝉联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
1982 年-1985 年	在第七届（1982-1985）和第八届中委会（1985-1988），他继续蝉联副秘书长。
1986 年	继续蝉联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

1987 年 10 月 22 日	林吉祥遭警方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李霖泰暂代秘书长职位
1990 年 9 月 12 日	李霖泰宣布辞去行动党直辖区主席的职位和退党
1990 年 9 月 29 日	李霖泰宣布辞去行动党副秘书长之职，但保留武吉敏登区国会议员身份，直到国会任期届满为止。
1990 年 10 月 12 日	李霖泰宣布退出政坛
1991 年 8 月	担任全国防止滥用毒品协会成立的民族团结及青年局副局长
1995 年	获得霹靂州苏丹封赐拿督勋衔
2002 年	获得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的勋衔 PSM JMN SPDK SMW DPMS DPMP
2003 年	获得雪兰莪州苏丹封赐拿督勋衔
1992 年-2005 年	担任马来西亚全国反毒品滥用（PEMADAM）协会主席
2004 年-2005 年	委任皇家警察提升特别委员会成员
2005 年-2008 年	担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
2007 年	委任林甘司法丑闻短片 3 人独立调查小组成员
2000 年-2002 年	委任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的成员
1992-2005	担任全国反毒品滥用协会副主席
2000-2001	担任全国经济商讨理事会理事
2000-2002	委任大马人权委员会成员
2000-2005	担任吉隆坡中央医院探访委员会主席
2004-2005	委任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提升特别委员会委员
2005 年 6 月 23 日- 2008 年 6 月 23 日	担任国民服务理事会主席
2006	担任吉隆坡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东姑阿都拉曼基金会信托人

2000-2001	委任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
2000 - 2001	委任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
2004 -2005	委任皇家警察委员会成员
1996-2/2008	委任吉隆坡市议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2002-2014	担任实达基金会主席
2005 -6/2008	担任国民服务委员会主席
2010-2015	担任公积金董事会会员
直到 2017 年还担任 的职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主席 2. 马来西亚研究所道路安全研究主席 3. 大马防范罪案基金会副主席 4. 1 个马来西亚基金会信托董事 5. 隶属卫生部的捐献器官教育小组主席 6. 马来西亚开放大学主席与董事 7. 隶属卫生部的推广精神健康顾问委员会会员 8. 隶属首相署公众投诉机构咨询委员会会员 9. 马来西亚肾脏基金会信托董事

附表二： 李霖泰从 2000 年至 2017 年获得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年份	荣誉博士学位
2000 年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2 年	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荣誉博士
2012 年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荣誉哲学博士（社会工程）荣誉博士
2013 年	国能大学（人力资源开发）荣誉博士
2016 年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荣誉博士（社区与团结）
2017 年	亚洲大都会大学（AMU）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资料来源：整理自《星洲日报》，2017 年 12 月 11 日

附表三： 李霖泰获得的勋衔与表彰

年份	勋衔与表彰
1986 年	WINNER OF THE OUTSTANDING YOUNG MALAYSIAN AWARD PRESENTED BY JAYCEES MALAYSIA
1991 年	RECEIVED THE ONN JA'AFAR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ROM MALAYSIANA MUDA FOR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UNITY AND A MALAYSIAN SOCIETY
1993 年	JOHAN MANGKU NEGARA (JMN)
1995 年	CONFERRED THE DARJAH DATO' PADUKA MAHKOTA PERAK (DPMP)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O'
1996 年	RECEIVED THE CONSUMER PERSONALITY AWARD 1995 FOR HIS CONTRIBUTION TOWARDS CONSUMERISM
1996 年	RECEIVED THE ROTARY PAUL HARRIS FELLOWSHIP AWARD FOR SERVICES RENDERED TO SOCIETY
1997 年	RECEIVED THE SREE NARAYANA GURU AWARD FROM THE GURU DHARMA SOCIETY FOR CONTRIBUTION TO HUMANITY
2000 年	CONFERRED THE HONORARY DOCTORATE OF LAW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29TH CONVOCATION OF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1 年	RECEIVED OUTSTANDING AWARD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IN REGARD TO HIS SERVICES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MALAYSIA CRIME PREVENTION FOUNDATION (MCPF)
2002 年	MELVIN JONES FELLOWSHIP RECEIVED THE LIONS INTERNATIONAL MELVIN JONES FELLOWSHIP IN RECOGNITION OF HIS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2002 年	RECEIVED THE PANGLIMA SETIA MAHKOTA (PSM)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OF “TAN SRI”
2002 年	CONFERRED THE HONORARY DOCTORATE OF LETTE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6TH CONVOCATION OF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2002 年	RECIPIENT OF LANGKAWI AWARD 2002
2003 年	CONFERRED THE DARJAH DATO’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DPMS)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O’
2004 年	RECIPIENT OF MALAYSIAN MEDICAL ASSOCIATION (MMA) 2004 HEALTHCARE SERVICES AWARD
2005 年	RECIPIENT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XCELLENT AWARD
2006 年	RECIPIENT OF THE SATHYA SAI LIFE HUMANITARIAN AWARD
2008 年	RECIPIENT OF NATIONAL UNITY AWARD

2009 年	AWARDED THE SERI MAHKOTA WILAYAH (SMW)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UK SERI
2009 年	CONFERRED THE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AWARD BY TI DISTRICT 51 FOR HIS OUTSTANDING DEDICATION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HUMAN DEVELOPMENT, HEALTH AND SAFETY AFFAIRS, CIVIL AND SOCIAL CONCERNS.
2010 年	RECIPIENT OF THE “PINEL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 TOWARDS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2010 年	APPOINTED JUSTICE OF PEACE FOR STATE OF SELANGOR BY HRH SULTAN OF SELANGOR
2011 年	RECIPIENT OF SENIOR CITIZENS GOLDEN YEARS AWARD
2011 年	CONFERRED THE BRANDLAUREATE BRAND ICON LEADERSHIP AWARD
2012 年	CONFERRED THE SERI PANGLIMA DARJAH KINABALU (SPDK) (ILLUSTRIOUS ORDER OF KINABALU, SABAH)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OF DATUK SERI PANGLIMA
2012 年	CONFERRED THE HONORARY DOCTOR OF PHILOSOPHY (SOCIAL WORK)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4TH CONVOCATION OF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2013 年	CONFERRED THE HONORARY DOCTOR OF PHILOSOPHY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6TH CONVOCATION OF UNIVERSITI TENAGA NASIONAL
2014 年	RECIPIENT OF THE TRUCK MAN OF THE YEAR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DEDIC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WARDS PROMOTING ROAD SAFETY
2015 年	APPOINTED CHIEF JUDGE OF THE STAR PUBLICATION'S GOLDEN HEARTS AWARD 2015 BY THE STAR MEDIA GROUP

资料来源：叶建安（李霖泰助理）

附图：

附图一：安邦（Ampang）的一位马来小贩把锦旗交给李霖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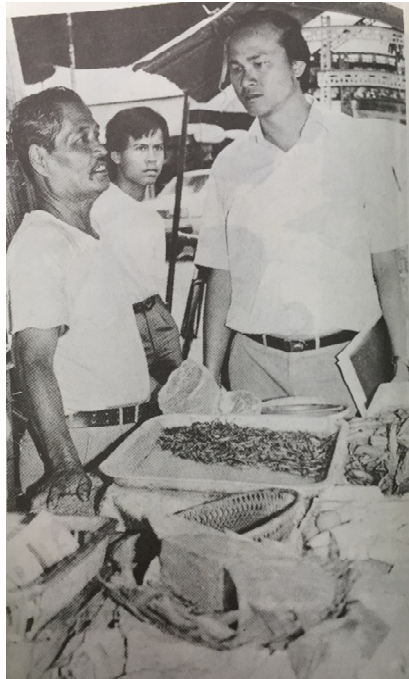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大众报》（1988 年 8 月 22 日）。

附图二：李霖泰走访中南区菜市场时，与小贩握手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新晚报》（1988 年 7 月 28 日）。

附图三：李霖泰走访半山芭（Pudu）菜市场时，与小贩沟通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Vinpress Sdn. Bhd. (1985), *Lee Lam Thye di mana-mana*。

附图四：李霖泰在茨厂街(Petaling Street)和市民一起清除垃圾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星洲日报》（1989 年 5 月 10 日）。

附图五：李霖泰走访陈秀莲路（Jalan Chan Sow Lin）的水灾灾区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Vinpress Sdn. Bhd. (1985), *Lee Lam Thye di mana-mana*。

附图六：李霖泰巡视 Sri Selangor 区组屋附近的沟渠情况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Vinpress Sdn. Bhd. (1985), *Lee Lam Thye di mana-mana*。

附图七：李霖泰巡视木屋区时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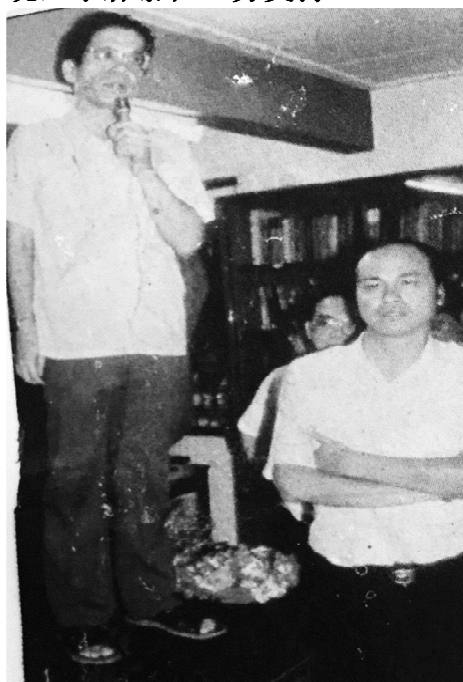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东方日报》（2007 年 2 月 1 日）。

附图八：半山芭居民在李霖泰办公室寻求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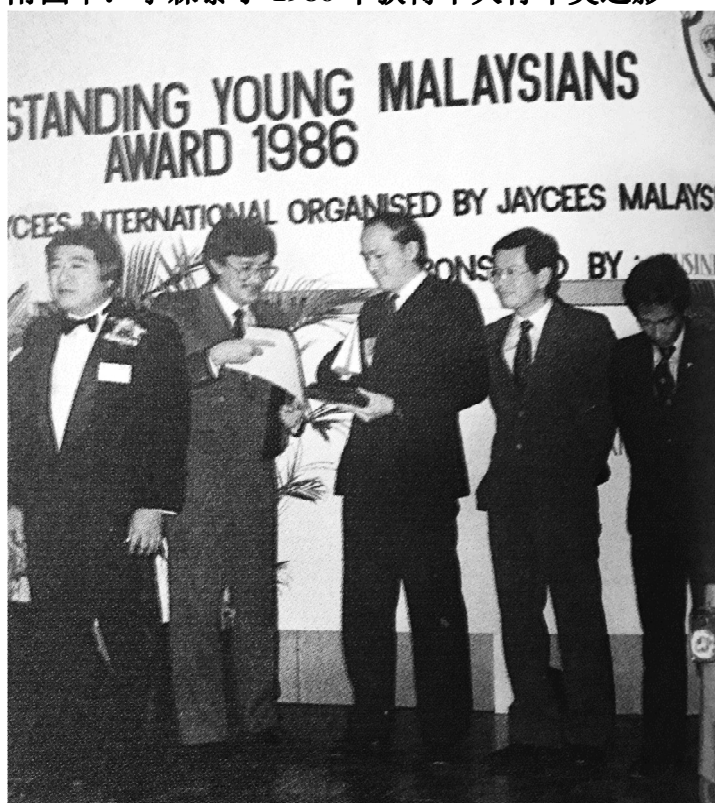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Vinpress Sdn. Bhd. (1985), *Lee Lam Thye di mana-mana*。

附图九：1989 年，在内案发令下被捕的林吉祥获得释放后，站在台上演说，李霖泰在一旁支持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东方日报》（2007 年 2 月 1 日）。

附图十：李霖泰于 1986 年获得十大青年奖之影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李霖泰《净言集》。

附图十一：李霖泰于 1993 年获得最高元首封赐对国家服务有功勋章 JMN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李霖泰《诤言集》。

附图十二：李霖泰于 1995 年 4 月在霹雳州江沙皇宫接领霹雳州苏丹颁赐 DPMP 拿督荣衔之影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李霖泰《诤言集》。

附图十三：李霖泰巡视营地，并与营员了解营中的生活情况



资料来源：翻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东方日报》（2007 年 2 月 1 日）。

附图十四：笔者与叶健安先生进行访问



资料来源：拍摄于 2017 年 9 月 8 日，于李霖泰绿盛世基金会办公室。

参考文献:

《大众报》（1986 年 19 月 6 日），〈9 百元议员李霖泰，马来人眼中的“怪人”〉。

《大众报》（1988 年 3 月 28 日），〈受市政府厚待，国会也吃得开，李霖泰惹火国阵议员〉。

《大众报》（1987 年 7 月 31 日），〈本报记者眼中，李霖泰的 10 分钟〉。

《东方日报》（2010 年 2 月 22 日），〈大半生勤于民生，李霖泰乐在其中〉。

何启良主编（2003），《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何启良主编（2014 年 11 月），《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雪兰莪：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何启良、林水椽、何国忠、赖观福合编（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至第三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社。

何豫梁、江振轩编撰（2003），《李霖泰与国民服务言行录》，吉隆坡：国民服务计划训练局。

利亮时（2014），〈李霖泰〉收录于何启良主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雪兰莪：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李光耀（2000 年 9 月 16 日），《李光耀回忆录》，台北市：世界书局。

李霖泰（1996），《诤言集》，雪兰莪：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梁启超（2008），《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廖文辉（2017），《马来西亚史》，雪兰莪：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陆兆福、伍薪荣、黄书琪、丘光耀，《认识民主行动党》，吉隆坡：民主行动党政治教育部。

民主行动党编（1991），《民主行动党 25 年奋斗史》，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

《南洋商报》（1985 年 7 月 6 日）〈温任平：第三只眼，谈李霖泰〉。

《南洋商报》（1986 年 5 月 13 日），〈李霖泰：雇主疏忽而致意外，工人有权要求赔偿，吁设立安全保健学院训练工人〉。

《南洋商报》（1986 年 7 月 24 日），〈李霖泰半夜不回家，家庭主妇齐齐上门〉。

《南洋商报》（1987 年 11 月 30 日），〈李霖泰披露接获首相署书面答复，政府斥巨资建筑长屋，将沿岸木屋居民迁移〉

《南洋商报》（1988 年 1 月 1 日），〈李霖泰促社保机构，提高会员保险款项，制定更多惠益工人计划〉。

《南洋商报》（1988 年 2 月 23 日），〈李霖泰：行动党党员齐心必能渡难关，党路线政策绝不改变，将拨动国内外影响力使七领袖释放〉。

《南洋商报》（1989 年 1 月 27 日），〈李霖泰促信贷担保公司简化手续，政府应公平处理贩商贷款，建议贩商贷款基金增至 6 千万元〉。

《南洋商报》（1989 年 7 月 4 日），〈李霖泰向政府建议，开放玛拉学院门户，让各族学生有机会深造〉。

《南洋商报》1989 年 9 月 9 日，〈李霖泰针对隆市长谈话，吁政府增建出租组屋，供无能力购买者居住〉。

《南洋商报》（1990 年 9 月 27 日），〈李霖泰辞职风波，陈国伟否认与李氏不和，加巴星称林李不和说无稽〉。

《南洋商报》（1990 年 9 月 27 日），〈霖泰澄清辞职原因，无关华团人士加盟〉。

《南洋商报》（1990 年 10 月 1 日），〈李霖泰简历〉。

《南洋商报》（1990 年 10 月 4 日），〈李霖泰辞职•时机对行动党不利，林吉祥：大选或提前〉。

《南洋商报》（1991 年 8 月 7 日），〈反毒工作由学生做起，毒品为祸责无旁贷，强制学府参与反毒〉。

《南洋商报》（1991 年 8 月 11 日），〈约半囚犯因毒品坐牢，李霖泰：各族应携手扑灭毒品〉。

《南洋商报》（1990 年 9 月 11 日），〈蕉赖路收费站引起问题，是民生非种族问题，李霖泰驳斥首相言论〉。

《南洋商报》（1990年9月25日），〈行动党高层领袖表态，促李霖泰打消辞意〉。

《南洋商报》（1990年9月28日），〈霖泰辞职风波闹大，林吉祥召见陈国伟，要他解释直辖区事〉。

《南洋商报》（1990年10月1日），〈李霖泰突退隐•各党皆有机会，武吉免登国席成焦点〉。

《南洋商报》（1990年2月10日），〈李霖泰：若要确保公元二千年木屋绝迹，政府应在直辖区境内，大规模建廉价中价屋〉。

《南洋商报》（1990年10月4日），〈李霖泰贤内助心愿得尝，是他多与孩子接近时候了〉。

《南洋商报》（1990年11月29日），〈退隐两个月后终打破缄默！霖泰：我没有对不起谁〉。

《南洋商报》（1991年1月11日），〈退出政坛•动向明朗，李霖泰日内出任郭氏基金会顾问〉。

《南洋商报》（1991年2月23日），〈李霖泰仍为民服务，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献给社会公益事业〉。

《南洋商报》（1991年3月1日），〈李霖泰专栏〉。

《南洋商报》（1991年10月28日），〈联合国应扩大加强，对抗滥用毒品问题，李霖泰：设国际法庭审毒贩〉。

《南洋商报》（1991 年 10 月 29 日），〈离开戒毒所前吸毒者，70%重坠入“毒海”〉。

《南洋商报》（1993 年 8 月 1 日），〈李霖泰专栏: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令的重要性〉。

《南洋商报》（1994 年 2 月 27 日），〈李霖泰专栏:成立高楼安全监督委员会〉。

《南洋商报》（1995 年 7 月 31 日），〈李霖泰专栏: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

《南洋商报》（2001 年 4 月 7 日），〈李霖泰“解毒”8 年，除不了根却上瘾〉。

丘光耀（2007），《超越教条与实务: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研究》，雪兰莪：大将出版社。

《诗华日报》（1985 年 6 月 9 日），〈不求名利不胡闹 我欣赏李霖泰！〉。

孙和声、唐南发合编（2007），《风云五十年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吉隆坡：燧人氏事业出版。

《通报》（1986 年 6 月 4 日），〈选民找李霖泰投诉，牙医替人拔错牙〉。

《通报》（1986 年 6 月 4 日），〈李霖泰专访〉。

《通报》（1989 年 4 月 16 日），〈李霖泰：九零年经济政策，不能再重蹈覆辙〉。

《通报》（1990 年 9 月 27 日），〈陈国伟恩将仇报，霖泰痛心疾首，大选或退政坛〉。

《通报》（1991 年 5 月 13 日），〈李霖泰本着为国为民原则，准备担任各机构顾问〉。

《通报》（1990 年 9 月 30 日），〈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李霖泰退出政坛文告全文〉。

王国璋（1997 年 6 月），《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

韦伯著，钱永祥、林振贤、罗久蓉等译（2004），《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谢诗坚（1984），《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槟城：友达企业有限公司。

《新明日报》（1990 年 10 月 4 日），〈霖泰辞所有党职，自言痛苦作决定〉。

《新明日报》（1992 年 12 月 25 日），〈李霖泰专栏:自我管制安全的文化〉。

《新明日报》，（1994 年 3 月 3 日），〈李霖泰专栏:为全民塑造具有意义的 1994 年〉。

《新晚报》（1989 年 7 月 7 日），〈李霖泰：实行居者有其屋，政府在纸上谈兵〉。

《新晚报》（1989 年 11 月 5 日），〈李霖泰：唯一途径，确保华小不变质，21（2）条文须废除〉。

《星洲日报》（1983 年 12 月 18 日），〈人物专访系列:全职政治工作者，李霖泰〉，第 3 版。

《星洲日报》（1989 年 1 月 24 日），〈李霖泰吁请有关当局，将五千万贷款基金，公平贷给各族商贩〉。

《星洲日报》（1989 年 5 月 10 日），〈李霖泰弃国计就民生〉。

《星洲日报》（1989 年 7 月 9 日），〈李霖泰说：马欲成新兴工业国，须结束新经济政策〉。

《星洲日报》（1989 年 8 月 1 日），〈李霖泰促请马华部长，在内阁争取舞狮，列入国家文化中〉。

《星洲日报》（1989 年 11 月 6 日），〈李霖泰促教长安华，好好利用教育拨款，协助各源流学校〉。

《星洲日报》（1990 年 4 月 12 日），〈李霖泰促关注合作社，房屋工程中途停顿事，并设特别基金挽救计划〉。

《星洲日报》（1990 年 8 月 24 日），〈如今才提呈出售廉价组屋报告书，李霖泰指国阵政府没履行，82 年大选居者有其屋诺言〉。

《星洲日报》（1990 年 9 月 24 日），〈李霖泰促市政局官员，停止骚扰商店业主〉。

《星洲日报》（1990 年 9 月 25 日），〈李霖泰不会跳槽，冀揪出党内寻找代罪羔羊者〉。

《星洲日报》（1990 年 9 月 26 日），〈辞职无关收费站问题，李霖泰坚决声明，绝不跳槽党〉。

《星洲日报》（1990 年 9 月 30 日），〈李霖泰退出政坛，保留国会议席至大选〉。

《星洲日报》（1990 年 10 月 7 日），〈李霖泰就任最后一天国会议员，为茨厂街后巷摊主解难〉。

《星洲日报》（1990 年 11 月 9 日），〈火爆助理闹上警局，卷走基金风波升级，霖泰引退未得安宁〉。

《星洲日报》（1990 年 11 月 10 日），〈“我没私吞基金！”，不满琐碎课题被渲染，李霖泰交律师处理〉。

《星洲日报》（2017 年 12 月 11 日），〈表彰对社会贡献，李霖泰获 AMU 荣誉博士〉。

叶观仕（1995），《马来西亚政坛名人录 1883-2003》，雪兰莪：名人出版社。

张隆志（2014 年 11 月），〈大众史学专题〉《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刊》，第八期，页 15。

《中国报》（1988 年 9 月 1 日），〈霖泰评首相演词，团结概念政治化〉。

《中国报》（1989年4月11日），〈李霖泰：种族性固打制，民行全力反对〉。

《中国报》（1989年7月5日），〈霖泰•金华，华裔未受压迫论，首相分析难服人〉。

《中国报》（1989年7月12日），〈李霖泰：吊销执照不能治本，应教育小贩保清洁〉。

《中国报》（1989年10月13日），〈霖泰呼吁市局官员，勿以清洁为藉口〉。

《中国报》（1989年11月6日），〈霖泰促拟明确政策，保障残缺人士权益〉。

《中国报》（1989年11月13日），〈霖泰吁提高贷款额，协助小商发展业务〉。

《中国报》（1989年11月26日），〈保障红登记木屋居民有栖所，霖泰促市政府检讨房屋政策〉。

《中国报》（1990年5月1日），〈李霖泰：屋商擅起价，金狮应插手〉。

《中国报》（1990年5月21日），〈牙也新村民生问题，李霖泰矢尽力解决〉。

《中国报》（1990年9月26日），〈李霖泰辞职•真相曝光，3党要专唱反调，当众退席惹怒火〉。

《中国报》（1990年10月1日），〈尤索诺：霖泰教训民行，须改斗争方式〉。

《中国报》（1990年10月1日），〈霖泰说走就走市民依依难舍〉。

《中国报》（1990年10月1日），〈呈辞的后遗症〉。

《中国报》（1989年10月9日），〈新财政年，霖泰促安华力争，合理华小拨款〉。

《中国报》（1990年10月19日），〈从政全为李光耀，贫困磨不灭理想〉。

《中国报》（1990年9月25日），〈霖泰突辞职，引爆党内讧，收费站种祸，吉祥赶灭火〉。

《中国报》（1990年10月29日），〈作风温和被孤立，空有声望无势力〉浪奔浪流，李霖泰，第12篇。

《中国报》（1991年1月7日），〈用退休金开办事处，霖泰重出江湖〉。

《中国报》（1991年2月27日），〈不再论政•自当老板，霖泰开服务公司，为民跑政府事务〉。

《中国报》（1991年9月28日），〈掌管民族团结局，霖泰招兵买马，集思广益反毒〉。

《中国报》（1991年10月21日），〈李霖泰：华社勿再漠不关心，15万吸毒者，华裔近四成〉。

《中国报》（1994 年 12 月 20 日），〈职业安全健康研究院，明年杪开班招生〉。

《中国报》（2000 年 11 月 13 日），〈李霖泰建议列入宪法，保护残障人权利〉。

《中国报》（2001 年 6 月 16 日），〈李霖泰：中华文化基础，确保华教长存〉。

《中国报》（2003 年 2 月 9 日），〈担任非政府组织要职，投身社会，无关政治〉，C14 版。

《中国报》（2005 年 1 月 12 日），〈李霖泰：纳入教育部政策，确保学校安全卫生〉。

《中国报》（2006 年 2 月 15 日），〈身兼多职责任大，健康排第一〉。

《中国报》（2006 年 12 月 8 日），〈李霖泰：公平施政达全民团结〉。

《中国报》（2006 年 12 月 21 日），〈李霖泰：提升公共领域，职业安全醒觉〉。

《中国报》（2007 年 2 月 27 日），〈国民团结咨询委员会，李霖泰再任委员〉。

《中国报》（2016 年 2 月 15 日），〈身兼多职责任大，健康排第一〉。

祝家华（1994），《解构政治神话》，吉隆坡：华社资料中心。

Lee Lam Thye (2015), *Glue Sniffing Among Youths, Through My Eyes*, Kuala Lumpur: Open University Malaysia.

Vinpress Sdn. Bhd. Ed. (1985), *Lee Lam Thye di mana-mana (ahli parlimen yang dedikasi menjalankan tugas sepenuh masa)*, Kuala Lumpur: Vinpress Sdn. Bhd.

Metro (19 Jun 2011), "*Lee ketagih bekerja.* "

Utusan Malaysia(UM)(28 March 1995), "*Menjadi YB disegani.* "

Watan (2 Oct 1990), "*Profil Lam Thye Pemimpin Sederhana.* "